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青年身份的话语建构  
——以Bilibili《后浪》为例

研究生姓名: 张琦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淑芳 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新闻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

研究方向: 网络与新媒体

提交日期: 2021年5月20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琦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签名： 张淑芳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校外)签名： 纪伟序 签字日期： 2021.6.1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 (选择“同意” / “不同意”) 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琦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签名： 张淑芳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校外)签名： 纪伟序 签字日期： 2021.6.1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Youth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ake Bilibili's *houlang* as an  
example**

**Candidate:Zhang Qi**

**Supervisor:Zhang Shufang**

## 摘要

随着多元文化和思想的不断涌入,当代青年的价值认知早已成为了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主流价值观认可和传统文化传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5·4青年节, Bilibili视频网站播出的视频演讲《后浪》是一次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激烈碰撞,也是一次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话语事件并在青年身份的话语建构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

本文立足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借助诺曼·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结合案例本身,制定了适用于当下新媒体环境和话语事件的分析指标,力求解决如下问题:《后浪》话语及其评论分别通过何种方式建构了怎样的青年身份形象?

《后浪》历经了怎样的话语实践?此次话语事件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文章具体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以及社会实践向度三个维度入手解决上述问题。

通过三个向度的分析,可以发现:从文本角度而言,《后浪》话语整体上塑造了积极乐观的青年形象,而评论话语则呈现出消极态势;从话语实践向度而言,《后浪》话语生产者延续了从古至今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但相关评论和后续创作显然出现了互文性断裂的情况,甚至含有戏拟和歪曲传统文化的现象;从社会实践向度而言,《后浪》关注话语事件中媒介资源的争夺、解释权的争夺以及文化的博弈。总体而言,青年亚文化在此次话语事件中始终处于“景观式”抵抗,对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颠覆,但也不可彻底消解青年亚文化效能,辩证看待二者关系更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青年身份 话语建构 批评话语分析

##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multi culture and ideas, the value cogni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has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of common concern. The recogni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also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On May 4, 2020 youth day, the video speech *houlang* broadcast by Bilibili video website is a fierce collision between mainstream culture and youth subculture. It is also a representative youth discourse event, and there are ser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youth ident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Norman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case itself, this paper formulates the analysis indicators applicable to the current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discourse events, and strives to sol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hat ways do the discourse and its comments in *houlang* construct the youth identity image? What kind of discourse practice has *houlang* experienced? What kind of power relations and ideology are behind this discourse event? This paper solves the above problem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xt dimension, discourse practice dimension and social practice dimen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ree dimensions, we can fin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the discourse of *houlang* creates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youth image on the whole, while the comment discourse presents a negative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practice, the discourse producer of *houlang* ha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ideas and cultu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but the relevant comments and subsequent works obviously have intertextuality rupture, even including the phenomenon of parody and distor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 *houlang* focuses on the contention of media resources, the contention of interpretation power and the game of culture in discourse events. Generally speaking, youth subculture has always been in the "landscape" resistance in this discourse event, which has no substantial subversion to the society, but it can not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youth subculture efficiency, and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Keywords:** Youth statu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目录

|                                      |    |
|--------------------------------------|----|
| <b>1 绪论</b> .....                    | 1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
| 1.1.1 研究背景.....                      | 1  |
| 1.1.2 研究意义.....                      | 2  |
| 1.2 研究综述.....                        | 3  |
| 1.2.1 身份认同研究现状.....                  | 3  |
| 1.2.2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                | 7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0 |
| 1.3.1 研究方法.....                      | 10 |
| 1.3.2 创新点.....                       | 11 |
| <b>2 研究设计</b> .....                  | 12 |
| 2.1 费尔克拉夫分析方法的指标建构.....              | 12 |
| 2.1.1 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理论.....               | 12 |
| 2.1.2 《后浪》话语分析指标的建构：基于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 | 14 |
| 2.2 样本说明.....                        | 16 |
| <b>3 《后浪》的文本向度分析</b> .....           | 17 |
| 3.1 《后浪》的青年身份建构.....                 | 17 |
| 3.1.1 词汇选择.....                      | 17 |
| 3.1.2 语气与情态.....                     | 18 |
| 3.1.3 文本结构.....                      | 18 |
| 3.2 《后浪》评论下的青年身份建构.....              | 19 |
| 3.2.1 词汇选择.....                      | 19 |
| 3.2.2 语气.....                        | 19 |
| 3.2.3 情态化表达.....                     | 21 |
| 3.2.4 隐喻.....                        | 22 |
| <b>4 《后浪》的话语实践分析向度</b> .....         | 25 |

|                             |           |
|-----------------------------|-----------|
| 4.1 《后浪》文本的生产——粘贴.....      | 26        |
| 4.2 《后浪》文本的分配.....          | 30        |
| 4.3 《后浪》文本的消费.....          | 33        |
| 4.3.1 连贯性.....              | 33        |
| 4.3.2 拼贴/同构.....            | 35        |
| <b>5 《后浪》的社会实践分析向度.....</b> | <b>37</b> |
| 5.1 媒介资源的争夺.....            | 37        |
| 5.2 解释权的争夺.....             | 40        |
| 5.3 文化的博弈.....              | 41        |
| <b>6 结语.....</b>            | <b>47</b> |
| <b>参考文献.....</b>            | <b>49</b> |
| <b>附录.....</b>              | <b>55</b> |
| <b>后记.....</b>              | <b>56</b> |

# 1 绪论

目前，身份认同仍然是学界的研究热点。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多元文化的不断涌入，我国青年群体对于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群体认同、自我认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再者，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也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要不断推进青年的思想进步，做好青年工作。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就“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特别是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和回答了“青年为什么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怎样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系统的“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首先，习近平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sup>①</sup>并将其比喻为“穿衣服扣扣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好比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突出了青年价值观形成重要性；其次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sup>②</sup>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习总书记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归依，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sup>③</sup>构建统一的青年价值观，形成青年共同体，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根基。

①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②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③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2020年，我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严峻的战役里，“90”后、“00”后变成了抗疫主力军，奋斗在一线，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面貌。

Bilibili视频网站（以下简称“B站”）于2009年6月26日创建，最初是一个面向动画、漫画和游戏的受众群体而建立的视频创作和分享的平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不断渗透，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入驻B站，成为了国内中国青年聚集密度最高的以视频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交流平台。2017年1月2日，官方媒体共青团中央入驻，成为一名UP主。曾经定位于小众文化传播的B站开始与主流媒体合作，弘扬正能量，输出主流价值观，更好的塑造中国青年的思想意识。就此而言，Bilibili视频网站是国内最大的青年聚集地，也是开展青年身份研究的最优平台。

2020年5月4日“青年节”前夕，B站与7家媒体联合推出了献给青年一代的视频演讲《后浪》，随后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前黄金时段播出，该视频立即火爆出圈，各路媒体相继跟进报道，受众也不断转载评论，但是在此过程中慢慢开始出现争议，评论逐渐两极分化，最终发酵成为一次大型话语事件。2020年年度热词评选中，“后浪”一词完全当选。<sup>①</sup>在如此高涨的话语纷争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不同受众对于视频传达出的话语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对视频话语建构的青年身份也存在分歧。这不但反映出受众对于话语文本解读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价值观的割裂。

### 1.1.2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身份认同”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国内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小众文化，边缘性群体等研究领域。随着社会加速进步，多元文化的不断入侵，环境的包容度越来越强，对于主流文化认同的分歧也会越来越大，《后浪》话语事件已初见端倪。所以本文立足于身份认同研究重点，在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借助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深入话语事件背后，研究当下青年身份话语建构的过程，总结不同话语生产者建构出的青年身份异同，

<sup>①</sup><https://baike.baidu.com/item/bilibili/7056160?fr=aladdin>

从而揭示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致力于构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青年共同体。

## (2) 现实意义

首先，构建统一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观，做好青年工作，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青年作为强国建设的主体，除了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组成一支拥有同等价值观的青年共同体，凝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再次，网络用户数量的爆发式增长。2021年3月19日，根据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指出，“我国的网民数量已高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70.4%”。<sup>①</sup>在B站，截止2020年12月，B站的月活用户首次突破2亿，月粉丝增长数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sup>②</sup>作为当代年轻人最大的活动社区，建构良好的生态环境，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也已经成为B站的重大责任。面对我国网民数量的日益膨胀，面对B站用户活跃度的日益飙升，注重网络话语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矛盾已刻不容缓。

最后，多元文化的接入向我国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发起挑战。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渗透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触手可及的海量信息、纷繁复杂的语言环境、日益更新的文化观念不断冲击传统价值观念，尤其是在还未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青年时期更容易丧失传统道德观念。因此，有必要对当代文化进行研究，从而警惕文化入侵。

## 1.2 研究综述

### 1.2.1 身份认同研究现状

#### (1) 国外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

国外有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笛卡尔的西方理性哲学。1637年，笛卡尔在《论方法》中指出，自我的内核就是思想，内在思想意识构建自我身份，强调主体性。1784年，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拓展了笛卡尔的思想主体论，认为自我理性主体的形成是依附权威的过程。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从意识、自我意识到绝对精神的路线，自我的绝对精神状态呈现了自我与世

<sup>①</sup>[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8203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82036)

<sup>②</sup><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9588404/>

界的辩证关系。以上三种理论皆系身份认同启蒙主体论,认为人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统一体,能够自主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

18世纪末,随着欧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的发展,以及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的崛起,以自我为中心的启蒙主体论逐步向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过渡,摒弃“我思故我在”的认同观,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对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塑造。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弗洛伊德消解了启蒙主体,认为自我认同自始至终在与社会力量博弈。阿尔都塞提出认同“既定观”。拉康认为文化认同被迫屈服于男权社会。福柯进一步确认,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权力,个人思想、行动,社会统筹协调无一例外受到权力控制。所以,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重点关注社会与个体、个体与他者的关系。后来,西方本质主义思想向相对主义转变,出现了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身份认同理论,主体不再拥有一尘不变的身份定义,而是随着社会、文化、权力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不仅限于哲学领域。1940年,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将身份作为一个技术术语最早引入社会心理学,并进一步做了一系列有关内在、族群、生命等认同发展研究。埃里克森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同危机已经成为社会群体的典型表征。耐尔森·富特(Nelson Foote)和斯特劳斯(Strauss)从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视角切入,认为认同是一种人们互动的过程和事实。1960年,各种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涌入不断拓宽认同的研究边界。格里高利·斯通(Gregory P.Stone)借助“情境”概念将认同定义为“个体在情境中所获的一种意义,且这种认同是不断变化的”,<sup>①</sup>在社会学领域,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导致社会角色多元化,加之制度和宗教的影响,认同成为一个“前沿术语”。斯崔克(Stryker)提出“认同理论”、汉斯·莫尔(Hans Mol)认为认同是宗教的核心。哈贝马斯则进一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出发,提出认同由沟通能力、容忍和理性构成。至此,认同理论已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从心理学的一个技术术语到主流社会理论的综合概念,认同和身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样貌,反应了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所以,在进行“身份认同”研究时,需考察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宏观因素,以便更好驾驭理论,服务社会。

<sup>①</sup>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50-53.

## (2) 国内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

我国有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一篇研究来自于1996年，文章围绕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展开。纵观我国身份认同研究时间线，2004年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开始呈现增长态势，到2021年每年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稳步增长百余篇，可见，从2004年至今，身份认同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横看身份认同相关研究主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群体身份认同研究，更多关注农民工、教师以及流动儿童等群体的身份认同现状、身份建构以及社会融入等问题；次要主题依次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等。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心理学、文学等。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体/群体认同研究，细化分为角色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以及地方性身份认同。角色身份认同大多数文章聚焦于农民工、流动人口以及流动儿童群体，从不同视阈考察群体的身份认同现状，提出建议帮助个体/群体实现身份认同、推进社会融入进程。张文宏、雷开春（2008）从户籍类型、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多层面调查得出城乡新移民总体社会认同度不高。周明宝

（2004）、陈映芳（2005）、郑松泰（2010）、潘泽泉（2017）等人分别结合不同社会表征讨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现状。吉林大学邹英（2007）的硕士论文提出需要从内外部环境以及政策建构多管齐下解决身份认同矛盾。白文飞（2009）从社会学角度揭示了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困境，郑友富（2009）则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矛盾会影响人格发展，阻碍与城市的融合。女性角色身份认同也受到关注。华东师范大学马琳（2008）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出，社会和文化造就了性别，创造了性别认同，当下女性正处于女性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另外，少数同性恋角色群体，也逐渐受到关注。刘婧、王伊欢（2011）考察了近20年的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发现多数研究集中在身份建构、影响因素以及自我认同过程方面。

职业身份认同目前集中面向教师及媒体从业者群体。李茂森（2009）、李清雁（2009）、王彦明（2011）分别从课程改革、道德发展，公共性和批评精神缺失层面指出我国教师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樊昌志、童兵（2009）认为：“在传媒——政府——公众的传播结构作用下，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建构了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在改革进程中的传媒因为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

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中，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实行了反向的建构，进而建构出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sup>①</sup>

地方性身份认同往往伴随着群体认同。朱竑,钱俊希,吕旭萍 (2012) 以广州“小满村”为例,发现本地村民与新移民艺术家的地方认同感出现断层现象,两群体文化边界明显。钱俊希,杨槿,朱竑 (2015) 认为,“藏漂”通过想象和实践共同构建的群体身份认同本质上是对西藏地方性的认同,体现了外部与内部、他者与本体的矛盾过程。

第二,文化/文学认同研究。传统文化认同方面,丁琴海 (2009) 认为虽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越来越复杂,但是仍要平衡好传承本族文化与接受外来文化的关系。章石芳,卢飞斌 (2009) 研究发现当代菲律宾华裔中学生已高度融入当地文化,所以更要加强华语文化建设,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王爱平 (2006) 研究指出印尼华裔学生仍存在汉字语言环境,依然保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随着网络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亚文化的传播开始受到关注。由于对亚文化的关注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所以这部分内容将在第四部分“网络空间的身份认同研究”详细阐述。

文学认同方面,多从文学或电影入手,考察身份认同现状或变迁。王一川 (2002)通过分析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指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困境。李作霖 (2012)则把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引入文学分析,并提出四种策略。浙江大学邓楠 (2004) 的学位论文考察了在全球化语境中,拉美魔幻主义与寻根文学如何建构了文化民族身份认同。

第三,民族/国家认同研究。宏观层面的身份认同主要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社会环境展开论述。吕芳 (2010) 通过对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调查,认为大学生对国家认同度普遍较高,但是对共同体内涵的认识度不高,提出“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观,重视公共价值建构。浙江大学刘燕 (2007) 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文化霸权造成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危机。浙江大学张媛 (2014) 聚焦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媒介使用角度入手考察国家认同现状。

第四,网络空间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体现在探寻媒介使用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使用与受众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两部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黄薰

<sup>①</sup>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J].新闻大学,2009(03):22-29+9.

(2012)认为,新媒体环境下,小众文化交流渠道丰富便利,信息聚合度高,越来越多的交流主体积极参与身份认定,建立了亚文化身份。郑州大学高歌(2017)认为,bilibili视频网站特有的狂欢仪式是一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文化实践,是一种对主导性文化的抵抗,是一种寻求群体认同的过程。四川师范大学徐欢(2014)提出,网络游戏时代的青年亚文化以反讽和恶搞的形式表现出现实世界冷漠、角色混乱、群体性消极的认同危机。华中师范大学的王真(2018)论述了青年亚文化如何在风格抵抗、收编与反收编过程中与主导文化博弈,凸显了新环境下青年身份认同的新表征。南京师范大学李甜甜(2014)分析了网络空间中受众媒介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李琼(2014)的学位论文分析了不同社会化媒体是如何影响不同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展现了新媒体与人的关系,得出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人的自我形象割裂,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结论。

综上,国内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环境特色以及地域特色,研究主体集中,研究角度相对单一,边缘性少数群体的覆盖面较小,而有关青年身份认同的研究集中在媒介使用下的青年亚文化方向,但对于青年身份认同的话语建构却很少提及。

### 1.2.2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

#### (1) 国外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方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在经历了二十年代英国的‘实用批评主义’、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新批评主义’、法国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以及七十年代后半期文体研究发生的重大变革,最终于八九十年代形成一种以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历史语境下运作为己任的全面、动态的语言研究——批评语言学或批评话语分析。”<sup>①</sup>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西方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被统治阶级,对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主张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Gramsci、Althusser、Habermas、Michel Foucault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分别论述了政治社会与文明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语言与社会、话语权力的辩证关系,尤其是Foucault的话语理论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sup>①</sup>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1(04):305-310.

20世纪90年代,“《语言与社会》杂志的创刊以及几本重要著作的出版《语言与权力》(Fairclough 1989),《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Wodak 1989),《话语中的偏见》(vanDijk 1984)标志着批评话语分析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网络,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sup>①</sup>形成了Fairclough为代表的,以社会学、社会符号学、系统功能学为理论基础的英国学派;以vanDijk为代表,重点研究“社会——认知”话语的学派;以Wodak为代表,“话语——历史”为分析模式的“历史学派”,三者虽然存在基础理论差异,但都致力于追求“公平的、自由的交流环境”。

经过西方学界多年的发展,批评话语分析已经发展成为稳固的学术流派。首先,批评话语分析广泛吸收了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等理论,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应用性广,理论基础雄厚的学科,其中,与应用语言学的结合是西方学界目前应用和研究的热点。其次,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批评话语分析拓展了多样的发展空间,例如语料库建设和语言分析软件的开发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准确的分析方法,定量和定性的结合也增强了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严谨性。最后,在当今西方社会,批评话语分析更注重对政治语篇的分析,通过对政治话语的分析,探究话语背后蕴含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意识形态,揭示权力阶级如何使用语言来引导人的意识形态,从而确保自身的利益,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

## (2) 国内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

我国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时我国正处于将话语分析概念的引进阶段,研究基本集中于对批评话语分析整体或部分的梳理,并提出其重要性和可实践性。廖益清(1999)梳理了1979年folwer等人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提出的话语分析方法,讨论了意识形态与话语的辩证关系。丁建新和廖益清(2001)就批评话语分析产生的理论背景、基础理论以及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并指出该方法对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纪玉华(2001)追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系统功能语法、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三种研究方法互相补充致力于分析文化和社会。经过前期梳理,批评话语分析逐渐在国内得到认可,研究不再单一面向于介绍理论,而是转向述评和构建阶段,进一步探究适合当下国内环境的分析模式。刘立华(2008)

<sup>①</sup>刘立华.批评话语分析概览[J].外语学刊,2008(03):102-109.

在梳理批评话语分析概念和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偏见,并提出新的发展方向。王泽霞、杨忠(2008)基于Fairclough的三维模式建立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三维动态分析模式,旨在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李发根、刘明(2008)比较分析Fairclough和Gee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探究二者如何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构建新的研究模型。

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基于批评话语分析和多学科方法结合的实证研究,这也是当前热门研究视角之一。首先,研究大量集中于新闻语篇研究,多就某一主题或事件报道探究国内外媒体报道隐含的意识形态,或就媒体报道探究某一群体的身份话语建构。邵斌、回志明(2014)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探究西方媒体下的“中国梦”话语,发现西方媒体多持肯定态度,但也存在否定和偏见,时常与欧洲梦、美国梦相比较,展现其联系和差异。朱桂生、黄建滨(2016)立足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以美国《华盛顿邮报》为例,探讨美国主流媒体如何建构“一带一路”,呈现出怎样的中国形象。通过分析发现事实上,美国主流媒体塑造了一种殖民扩张,重利轻义的霸权中国形象。徐素萍(2011)通过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2011年两会报道的比较分析,得出中美两国的传播差异。朱桂生、黄建滨(2018)从媒体话语策略及文化语境入手,分析新闻媒体话语将我国青年医生群体塑造成一种“缺乏经验、傲慢冷漠、不负责任的施暴者形象,”<sup>①</sup>这与中国转型带来的信任危机,虚拟化导致的群体责任缺失有关。

其次,其它类型的批评话语分析语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王洪颖(2010)以美剧《绝望主妇》第一季前十集的冲突话语为研究对象,聚焦口语语篇,揭露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意识形态。李桔元(2008)从互文性角度对医药广告进行了分析,反映了广告话语与医药规范性话语之间的权力斗争,凸显了消费主义对广告话语的影响。

再次,通过研究某一时间跨度内同一主题下语篇的变化分析得出社会文化的变迁。钱毓芳、田海龙(2011)将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对1999年—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得出中国的社会变迁。江南大学刘思远(2016)基于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理论,对近20年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民众使用网络流行语的目的从最初的满足人类交际需求到乐于创作,

<sup>①</sup>朱桂生,黄建滨.青年医生形象的媒介话语建构:从语言偏见到信任危机[J].当代青年研究,2018(03):12-18.

成为一种“表达诉求、话语权争夺、表达并宣泄的工具”，<sup>①</sup>最终政府把握了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权，用于自身形象建构以及社会管理。

最后，历经了大量运用研究阶段，新环境下批评话语分析呈现出了新态势，国内学者就发展前景提出了新理论导向。田海龙（2015）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和理性的反思，提出要对新修辞运动和批评话语分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从而引发了在后现代主义下对语言研究的深入思考，力图进一步推动跨学科发展。黄国文（2018）基于韩礼德话语分析模式勾画出一个适合中国语境的新模式——和谐话语分析。

综上，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是我国重要的研究理论之一，适用性强、范围广，通过外显的语篇话语剖析出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博弈，能深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当前我国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主要聚力于新闻媒体报道语篇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探索，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青年文化研究接触较少，中山大学胡上（2013）从《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电视文本出发，总结隐含的青年文化表征，即“重新词汇化、过度词汇化、隐喻性和反抗性，以及不正式的、轻率的语言风格”。<sup>②</sup>但整体来说，将青年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屈指可数。所以，在新媒体环境下，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探究我国青年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主题，将作为本文创新点提出。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基于语言学发展起来的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是指从文本的表层逐步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通过普通阅读所显现的深层意义。<sup>③</sup>文章第三部分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后浪》文本和《后浪》评论文本从语言学词汇和语法表达的角度进行话语研究，具体根据文章第二部分分析指标中的词汇、语法、情态化表达以及隐喻等方面对话语进行文本分析，从而挖掘出不同

<sup>①</sup>刘思远.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网络流行语研究[D].江南大学,2016.

<sup>②</sup>胡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青年话语和青年文化[D].中山大学,2013.

<sup>③</sup><https://baike.baidu.com/item/文本分析法/4438929>

话语所建立的不同青年身份之间的差异。

### (2)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通常是指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归纳推理得出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本文选取B站的视频演讲《后浪》作为案例，主要着力点集中在《后浪》话语及其评论话语，结合相关文献和数据，借助费氏三维框架理论，从《后浪》话语的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进行剖析，分析出当代青年存在的认知差异，以及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最终致力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下青年身份认同的统一。

### (3) 等距抽样法

等距抽样法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抽样方法，是指在总体单位中，先按一定标志顺序排列，根据总体单位总数和样本单位数计算出抽样距离(即同等的间隔)，然后，按相等的距离或间隔抽取样本单位。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于Bilibili视频网站发布的《后浪》评论区中的评论，由于评论量过大，本文简单使用了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整体评论按照点赞数由高到低排列，设定样本距离为10条评论，最终得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样本。

## 1.3.2 创新点

本文内容方面的创新：一、国内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小众文化和边缘性群体领域，很少关注大范围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关注主流价值观下青年身份认同存在的矛盾冲突，并尽可能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领域。二、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的研究正逐步迈向新媒体领域，本文立足于新媒体平台的话语事件，分析主流话语和网络用户话语之间的关系，探究青年身份建构的异同。

方法创新：本文的主体研究方法是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遵循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结合新媒体环境构建符合案例特征的话语分析指标，以便于更好的考察青年身份话语建构现状，探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

## 2研究设计

本章节致力于说明本文的研究基础。首先在详尽阐述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分析理论上，进一步根据实际话语事件《后浪》，架构出详细的研究框架，具体到研究因素的筛选标准，使用方法以及预期效果等方面的阐述。

### 2.1费尔克拉夫分析方法的指标建构

#### 2.1.1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理论

1989年，费尔克拉夫创建了通过分析话语形式来实现分析语言、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并将其称为“作为文本、互动和语境”的三维模式。此模式的学术积淀来自于批评语言学，综合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福柯(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的结构主义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且又汲取了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法的精华，最终形成了新的分析方法。

在创建出新的话语分析方法之后，费尔克拉夫给定的解释为：话语由三个维度构成，它们分别是“语境”(context)、“互动”(interaction)和“文本”(text)。展开来讲，首先通过互动产生文本，其次互动中所包括的生产过程(process of production)和解释过程(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则都是以语境为前提条件和社会条件的。1995年，费尔克拉夫对此方法进行了完善，将“语境”更改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代替了中间环节的“互动”，并且将原有互动中所包括的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进一步替换更新为“生产”(production)、“分配”(distribution)和“消费”(consumption)三个过程。”这一套修改变更之后的话语分析方法一直被学界沿用至今，这也是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占据头等地位的理论成果，以下将详细展开论述。

##### (1)文本向度

文本向度的分析作为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中的第一维度，是后续两个维度的研究基础，目的在对于目标文本进行语言学方面的剖析。文本分析分为四个主题，分别是“词汇”(language)、“语法”(grammar)“连贯性”(cohesion)和“文本结构”(text structure)，每一个主题在具体结构中都被细化为多个研

究方法，这四个方面可视为研究结构的层层递进，节节提升。

词汇的研究主要涉及个体词语，研究方法也非常丰富，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也选择了几种研究方法进行介绍，但最重要的是先要明确词汇的三个研究重点，它并非研究词汇本身，而是聚焦于词汇的意义，即语词的表达、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以及语词表达是如何引起争论的，换句话说是在放在了可选择的隐喻冲突之上；语法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将简单句或分句和另一个句子连接在一起的连词，每一个分句都结合了观念的意义、人际间的意义以及文本的意义，具有多重功能。具体分析要素体现在情态（modality）、及物性（transitivity）、主被动语态（active or passive voice）、名词化以及主题的分析上；连贯性的关注点有别于语法，主要涉及分句和句子是如何被连接在一起的，注重连接句子的方式，方式的随意组合会构成话语结构的不同，最后导致意识形态的差异；如果说上述三个主题是文本分析的微观和中观层面，那么文本结构就属于文本分析的宏观层面了，它关注更大范围的整体结构，可称之为文本的“建筑学”。

## （2）话语实践向度

话语实践主要是指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由于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会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下会形成不同的话语类型，整个过程也会发生变化，研究话语实践能够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下探究背后不同的传播过程，从而彰显社会变化和文化变迁。

本节引入了话语分析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互文性。1972年，福柯指出：“不可能有什么陈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实现其他的陈述”。<sup>①</sup>费尔克拉夫继承了福柯的观点，将互文性分为“明确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互为话语性”）两个分支，明确的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被明确的吸收到另外一个文本中的情况，包括话语描述、预先假设、否定、元话语以及讥讽这几个分析要素；互为话语性则是注重一个话语类型是如何通过结合话语要素从而被建构的问题，它可以从文本的思路、样式、类型或者话语风格入手展开讨论。

费尔克拉夫把互文性概念归结为话语分析中最重要的地位，并将互文性的概念引入文本分析的过程中去，这一操作可以使互文性概念变得更加具体且更好驾驭；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的阐释文本和探究话语背后隐含社会关系。

<sup>①</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 (3)社会实践向度

在这一层面上，费尔克拉夫汲取了葛兰西和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经验理论成果，将话语置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旨在揭示话语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总结文化变化和社会变迁。

## 2.1.2 《后浪》话语分析指标的建构：基于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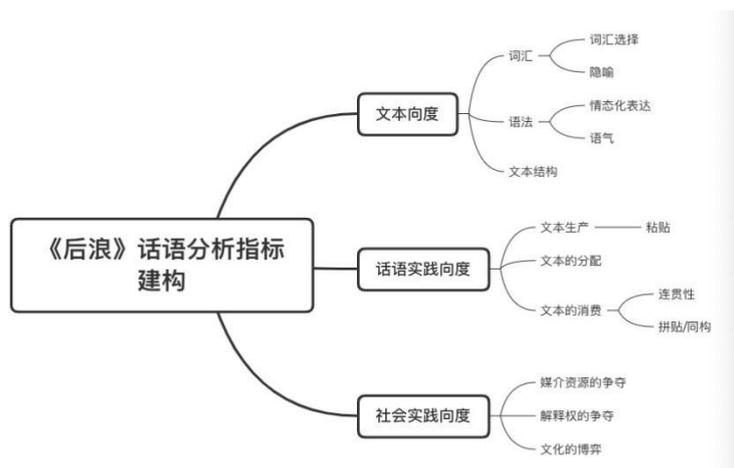


图2.1 《后浪》话语分析指标示意图

本文借助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后浪》话语本身，对原分析指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以便更适用于本文的案例。如图2.1《后浪》话语分析指标示意图所示，下文将对每一个分析指标的选择理由和效用进行详细的阐述。

首先，在第一维度的文本向度分析层面，本文选取了词汇和语法两个分析单元。在《后浪》文本层面的分析中，首先从词汇的选择入手，选取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汇来表明话语生产者所要传达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想要建构的青年身份形象定位；其次从语法角度展开，通过语气和情态化表达的分析路径，目的在于指明话语生产者的身份定位、态度定位以及主体的青年身份话语建构；在分析《后浪》文本中添加了一个指标即文本结构，由于原文本是一篇结构完整，脉络清晰的演讲稿，必定存在结构意义，所以有必要从文本结构角度出发探究背后的意识形态。关于《后浪》评价中的分析指标与上文同理，唯一不同的是由于评论是单独的简单句，甚至从语言学的严格意义上来说部分简单句存在语言成分缺失的状况，所以不采用文本结构的分析指标。并且，在收集到的评论样本中，

大多数语句没有逻辑可言且随意性较强,基本上没有涉及关联词及论证方法的表达,所以适当删除了这项指标。

其次,在话语实践分析向度中,主要陈述的是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重点关注互文性概念,并将其分为明确的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两种类型。根据以上理论基础,结合本次话语事件,将全过程分为文本生产、文本分配和文本消费三个分析单元。在文本生产分析单元中,关注《后浪》文本的生产逻辑和思路。明确的互文性的第一个指标“话语描述”,由于《后浪》文本中很少直接或间接的标识出引用他者的话语,所以“话语描述”的分析指标被省略;“预先假设”、“否定”、“元话语”以及“讥讽”,虽在文中有所体现,但是不明显且可分析性较小,故舍弃上述几种分析指标,继续向前追溯到吉拉尔·热奈特的《隐迹稿本》,其中最著名的互文性手法——共生关系和派生关系在《后浪》文本中也具有模糊性,难以找到明确的互文文本,所以从文字部分转移至视频的图片混剪部分,发现每一帧图片都是有迹可循且出处明晰,恰好适合互文手法中的“粘贴——资料合并”,故在文本生产分析阶段采用这一分析指标。

在接下来文本的分配和消费中,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文本传播和受众解释,最直观的分析指标则属于“互文性链条”和“连贯性”。“互文性链条”主要涉及《后浪》话语在发布后的媒体传播链以及受众的转发转推等传播过程,受众转发和转推的具体过程难以精准捕捉,所以本文从大众传播阶段入手,追踪视频从播出当晚开始,媒体以何种形式做了怎样的跟踪报道,以及后续在其他平台受众如何自发进行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在此过程中引起了怎样的话语纷争,这些都是“互文性链条”的重要组成环节;“互文性链条”的另一项指标中,主要关注的是文本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和发散性特征,同样围绕的是《后浪》播出后的传播实践和概念扩散展开。文本的消费过程即文本的“解释观”,互文性中“连贯性”作为处于文本消费分析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分析指标,将解释者分为“顺从者”和“抵抗者”,探究解释者和文本生产者有着怎样的不同的语境和意义空间。同时也借助了伯明翰学派拼贴和同构的思想分析除评论外的具有恶搞性质的原创性仿作,探究创作者的创作思路,发掘其中蕴含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最后,在社会实践向度,本文依然延续费尔克拉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两大方向,重点放在“权力”分析指标上。因为在此次话语事件中,《后浪》所

引起的话语纷争，本质上来说就是对青年身份建构的话语权的竞争。

## 2.2 样本说明

本文第三部分的研究样本全部来自于B站官方账号发布的《后浪》视频下方评论区，截止2021年2月底，总评论数达到了16002条（评论样本的选取只限于评论区的初级评论，跟帖评论不在抽样范围内）。由于样本数过大，故本文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整体评论按照点赞数从高到低排列，样本距离设定为10条评论来抽取样本，总共得到样本数1602条。排除跟帖评论和无效评论，这里的无效评论包括表情符号，原文复制以及非针对《后浪》内容的评论。所以，最终得到的样本数量1054条。此样本仅作为文章第三部分的研究对象。

### 3 《后浪》的文本向度分析

在批评话语分析下，文本向度分析是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理论的第一个分析维度，更侧重于微观层面的话语分析，与人际关系和人际意义特别相关，主要体现在“关系功能”和“身份功能”，本部分主要将注意力放在话语是如何建构社会身份的主题之上，重视官方话语和用户话语建构的青年身份，得出二者的矛盾性及分裂点。

整体上，文本向度分析以语言学为基础，关注文本的字、词、句、语篇等方面，具体把它分为两种建构方式，一种关注的是社会身份或自我身份的话语建构，另一种则集中于建构社会现实的有关方面。第一种社会身份的分析要素即文本的互动控制、情态、礼貌、普遍特质等，其中本文建构的指标主要是指情态化表达上；第二个社会现实建构的分析要素所涉及的主题有关联词及物证、及物性与主题、词语意义、词语表达以及隐喻等，相比较身份建构来说，社会现实建构指标更适合被本文所借鉴，结合以上两种方向，尽可能实现分析身份建构和社会现实建构的目的，论述本文第三章内容。

#### 3.1 《后浪》的青年身份建构

在B站视频《后浪》演讲词中，当代青年身份被建构为积极、自由、向上的活泼青年形象。通过主流媒体向以年轻群体为主体的受众群传播主流价值观，通过话语建构新时代青年全新的身份。

在实际研究中，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涉及语类、名词化、及物性、情态等指标，但并非每个研究都要对语篇中的每一个语言成分进行分析，只需重点分析具有社会意义的部分即可。因此，本文选择从词汇选择、语气与情态以及文本结构三个方面对《后浪》的演讲词进行分析。

##### 3.1.1 词汇选择

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下，文本向度分析中的词汇维度是最基础的一环，一个文本相同意义下词汇的选择表达了话语生产者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后浪》中，“国家”“世界”“现代”等名词的出现奠定了以宏观视角为出发

点，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宏伟壮大的叙事风格，表明话语生产者身居“高处”，且使用了一系列动词表明上述名词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好的积极态势，例如“面向世界”“步入现代化”以及“发展文化”“代表国家”等，描绘出一副宏伟壮阔的世界，激起受众对于现实世界美好生活的共鸣。而一些积极向上的形容词例如“繁荣”“繁茂”“繁华”则表达了对当下年轻人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的赞美与认同。《后浪》文本积极情感词语的选择和使用奠定了活泼、向上、激励的感情基调。

### 3.1.2 语气与情态

系统语言学的语言三大主体功能为语言具有的表意功能、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结合本文，重点研究语言的人际功能，即身份的建构功能，具体来讲指语言具有表达话语者的身份、态度等功能，其中也包括语气系统、情态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宣传片《后浪》中的讲述者何冰，以年长男性的形象出现，在此次演讲中多用陈述语气，与青年群体进行平等对话的姿态，展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看待多元青年文化的态度。同时，使用“那些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奔涌吧后浪”等祈使句，呼吁年长者主动理解、包容日益崛起的青年文化，激励青年群体持续发力，表达了对代际文化友好互动的期望。而演说中“就能”“应该”等情态动词的使用，增强了语气，使演说在情感上更具感染力。

### 3.1.3 文本结构

文本内部结构的安排也体现了话语生产者的立足角度，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和目的。话语生产者可以利用文章结构突出强调要重点传播的信息，使其走到台前，将信息“前景化”，相反，若是主动避开或隐藏部分内容，使受众在主观上无法直接感受内容，也就是将相悖信息“背景化”，这样的结构安排可以在无形之中引导受众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标准去解读文本，从而达到预设效果。在演讲《后浪》中，文本生产者主要描述了近些年我国的科技繁茂、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等傲人成果，表达了对当代年轻人在如此盛世中，能够尽情享有更多资源，拥有更多选择，可以勇敢做事，自由创新的羡慕之情，比如“自由学习一门语言”“把传统的变成世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展现了奋勇向前，积极向上的青年精神，

以上这些积极态势的信息全都都被“前景化”了，而同时存在的“忧伤和迷茫”在全文中只是一笔带过，甚至在后文否定转折，将消极信息隐匿“背景化”了。所以文本整体呈现正能量态势。

## 3.2 《后浪》评论下的青年身份建构

2020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前夕)Bilibili 弹幕视频网站发布了宣传片《后浪》，这部由B站联合7家主流媒体发布的视频，在受众评价上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本部分主要筛选与《后浪》价值观有所分歧的样本进行剖析，从文本维度的多个角度分析受众是如何从不同视角评价《后浪》所建构的青年身份的。

### 3.2.1 词汇选择

通过对B站《后浪》视频下抽取的1054份评论分析得出，首先，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有“迷茫”“现实”“废物”“普通”等，上述名词反映出观看本片的受众群体对于片中所建构的青年形象和所传递的价值观的否认和怀疑，凸显了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出现的矛盾；其次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不配”“可惜”“羡慕”等，显示出受众在接受原视频所展示的青年形象之后与自身环境和条件进行对比，得出上述动词反应，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差异性和对比性；最后，“无力”“渺茫”“沉重”等出现次数较高的消极形容词，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压力，同时也与视频中建构的青年后浪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 3.2.2 语气

在抽取的评论样本中，由于青年受众群体的组成多元化，需尊重个体差异。突出三种针对后浪青年形象建设的语气表达，分别是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下文分别列举几个例子：

#### (1) 陈述句

① “看完之后其实有点难过，因为我一点都不像这个视频里所说的那样的后浪，我现在二十岁仍在疑惑自己喜欢什么”

② “夜班回到出租房里，打开B站，打开动态，看到b站后浪的推送，嗯嗯，

配合我的拌面夜宵，视频很美好，晚安”

③ “我不配作为90后，迷茫，没有热爱”

④ “24岁，我在工地，刚转岗做安全员，未来的路是怎么样的，我说不清。”

⑤ “视频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上述5个例子全部使用陈述语气，也是样本中占比最多的语气。第①句明确指出了自己并不像视频中后浪的生活，同时也使用“难过”这样的消极形容词明确表达了自身现实生活与后浪所表达生活的差距，也使用否定词“不像”拉开与后浪的距离。①句和③句在表达方式上基本一致，也是直接使用明确否定词否定自己是新时代后浪，外加简要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更进一步阐释了差距。②句和④句没有使用明确的否定词否定自己与后浪的差距，而是较细致的描述自己现存的生活样貌，同样与视频中后浪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否定色彩也不言而喻。⑤句的两个分句之间含有隐性转折词，后分句直接否定了前分句，全盘否定了视频中传递的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样本中⑤句的陈述方式也较为普遍，前半分句先对视频给予肯定，后接显性或隐性转折连接词，否定前分句，表达不予认同的观点。总之，样本中大部分使用上述陈述句方式来表达现实中的青年身份形象并非“后浪”所传达出的样貌。

## (2) 疑问句

① “浪高还是海深？”

② “后浪？我只想着如何把生存变生活”

③ “我怎样才能像视频里的人一样优秀呢？”

疑问句相较于陈述句在语气部分明显加深了层次，更加有力的表达情绪。①句的疑问句并没有直接对后浪质疑，相反使用隐喻，将现实社会比作大海，再借用后浪的比喻将两者进行比较，采用问句的形式引发受众的思考。②句中问号紧跟“后浪”，直接对后浪发问，由于后半句的解释可以得出此处的问号并非单纯提问，而是具有反问的效果，也表达出对“后浪”青年质疑和不认可的态度。③句并非像前两句直接针对后浪主体发问，而是将主语换成自己，宾语是视频里的人，主语表示希望成为宾语那样的人，所以也表达出现实与视频不符的状态。

## (3) 祈使句

① “记住！绝大部分后浪是前浪的子女后代！”

② “摆摊吧，后浪！”

③ “看完之后充满干劲，感觉一下能搬亿吨砖！”

祈使句所表达的情感和语气比陈述句和疑问句都重，一般以感叹号结尾，直截了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①句中，两个句子分别使用了叹号，且前半分句中的“记住”具有明显提醒和加重语气的作用，后半句提出前浪的概念，也明显表示现实中大多数人不是前浪的后代，与后浪传递的价值观相悖。②和③句中都含有相反的意义，虽然是祈使句，但是两个分句表达的意思互为讽刺，“摆摊”和“搬砖”两个名词也暗示了当代青年对于现实生活的讽刺与无奈，直接表达了后浪的反差。

### 3.2.3 情态化表达

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情态化表达是重要的分析指标，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情态化动词或情态化语气不同，情态化表达在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它涵盖范围广，能有效反映出主体的话语建构，它的社会重要性的一个衡量尺度就是陈述情态之被质疑的程度，以及向斗争和转换开放的程度。所以，从宏观方面看，情态系现实含义和社会关系制定话语上的一个交叉点；从微观角度解读情态，即系统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情态则是语言人际功能和语言概念功能之间的交叉点。在《后浪》评论的样本中，通过例子说明情态化表达所展现出的“人际功能”：

① “我认为是的后浪，应该是像这次疫情中，千千万万奔赴前线的无名青年”

② “只能说这里面的生活跟我和我身边认识的所有人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我配不上叫“后浪”吧。”

③ “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④ “我只觉得有点尬，别的还好”

⑤ “更应该放一些劳动人民和为了生活奋不顾身的人们，而不是这些消费享乐的片段”

首先，情态具有主观性，情态助词与陈述动词搭配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某种程度的亲进度，其主观性也基本可以明确。在①、②后半分句以及④句中，主语“我”搭配谓语动词“认为”、“可能”、“觉得”均是在主观基础非

常明确的状态下阐释的,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说话者本人,也就是主语“我”正在表达对于《后浪》文本的“亲近性”,即“我认为”“我可能”“我觉得”正在作为主观情态标记出现。其次,情态常常在一个单一表达或一个句子的多重特征中得到实现。在①句中,主观情态标记词“我认为”和闪烁其词“应该”共同表达了低层次的亲近性;在②句后半分句中,同样道理,主观标记词“可能我”和不确定性“吧”也表达了低层次的亲近性。在③⑤句中,虽然没有明确的主观标记词,没有明确的主语标示,但是依据新媒体账号主体评论的惯例来说,这两句同样表达了评论主体的观点,也可视为含有“主观标记词”,只是此处的主观标记词被新媒体化了。③句中的“有点”,⑤句中的“应该”也显示了模棱两可,二者结合在一起也共同表达了低层次的亲近性。但是,除了上述情况之外,情态还包含着其他的东西。在①句中,主观标记词“我认为”和闪烁其词“应该”共同表达了对于《后浪》文本的低亲近性,即生产主体表明自己并不十分认可《后浪》所表达的观点,即对于相互作用的一致性较低。②③④⑤句同样在低亲近性语境下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陈述的低亲近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说明的权力的缺乏,并不是其他方面的缺失。

### 3.2.4 隐喻

隐喻作为建构社会现实文本向度的重要分析指标,曾被一致认为仅仅存在于诗歌当中,且唯一属于文学语言,并没有一开始就将其纳入话语分析体系,直到1980年,拉科夫和约翰逊在其研究中指出隐喻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语言和所有种类的话语中的现象,对于专业研究和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在此之后,隐喻不仅仅突破了作为文体修饰功能的存在,而且被认定为一个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建构社会现实的手段,形成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甚至是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通过隐喻来建构现实,可以最直观的反应话语实践所反映出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迁,一个特定领域被隐喻化的过程也是话语实践斗争的关键。所以隐喻逐渐成为分析话语建构现实的最重要的指标。<sup>①</sup>

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列举了1987年英国大选的例子作

<sup>①</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为体现隐喻建构现实的有效性。<sup>①</sup>在案例中,就军事防御问题本身和媒体对它们的表述之间展开论述,得出:媒体表述和军事防御问题本身存在着一种“一致性”,即竞选活动本身占统治地位的隐喻作为战争的隐喻出现,主要体现了一种媒体借助隐喻建构当前社会现实的方式。在《后浪》评论话语中同样存在用隐喻来建构的“现实”或建构“身份”,一些隐喻重复出现在不同话语生产者生产的话语中,明显表现出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表3.1对“评论”话语中的隐喻进行部分罗列。

表3.1 《后浪》评论话语隐喻情况

| 本体   | 喻体                                  |
|------|-------------------------------------|
| 《后浪》 | 鸡汤、迷魂汤、狗屁                           |
| “后浪” | 绚丽的生活、世界的中心、条件优渥的年轻人、富二代、刺激的玩乐、奔涌浩荡 |
| 自我   | 社畜、打工人、废物、一潭死水、劳动人民、普通人、平凡的人        |
| 生活环境 | 大海、深海、工地、迷茫和焦虑、作业,日夜兼程              |

从以上表格3.1可以看出,在不同生产者的话语中,《后浪》被隐喻为各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消极名词。《后浪》不仅没有引起年轻受众群体的共鸣,而且瓦解了青年群体本该有的朝气与蓬勃;没有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却引发了新的青年身份认同鸿沟。这些话语背后都体现了不同话语生产者对《后浪》视频本身以及它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的敌视和关于“他者”的想象。

在《后浪》视频中建构的新名词“后浪”被描述成为拥有“绚丽的生活”“条件优渥”“刺激玩乐”的“富二代”,以此突出之所以被称作“后浪”的现实条件。而在视频外的青年却将自己隐喻成“社畜”“打工人”“劳动人民”“普通人”等一系列含有贬低意味的名词,在这些词语中,“劳动人民”“普通人”原本之意并没有消极色彩,甚至在某些语境中“劳动人民”是被歌颂的社会群体,“普通人”也只是具有中性意味的普通名词,但是,在《后浪》评论语境中,话语生产者抬高了“后浪”的地位,比较之下将自己隐喻为低于“后浪”的存在,这不仅是两种认同博弈的体现,更明显表露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根深蒂固的对立思维。

另外,在评论中不仅仅只有对“后浪”身份认同的分歧,更多的群体也描述了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更直观的与“后浪”环境形成对比。出现频率较高的描

<sup>①</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述自己的生活为“焦虑和迷茫”，并非原文本中所描述的“很早就进入了不惑之年”；其次，“大海”“深海”也作为隐喻的喻体出现，一方面不仅描述了就算自己是浪花，在社会中就好像浪花进入大海，渺小且千篇一律，另一方面说明所处的生活环境好似深海，深邃且宽阔，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会被更多浪花看到，投入即消失。这些隐喻同样与《后浪》展示的生活形成了反差，突出了自身生活的现实性，不断通过话语中的隐喻，向受众传递了这一方面对比鲜明的图景，侧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群体的自我认同。

凭借以上隐喻，《后浪》评论的话语生产者言之凿凿地建构出了多种多样的现实，展现了有悖于“后浪”的青年身份，然而，这种建构不仅是多元话语生产者的片面呈现，还反映出了不同立场话语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自我身份认同。

经过上文的多角度的探讨，比较分析得出，《后浪》青年身份话语建构与评论身份话语建构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同。首先，有关《后浪》话语的青年身份建构定位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文明成果的享有者；多元文化的分享者以及时代洪流的推进者，评论话语的青年身份定位为：贫穷的“打工人”；迷茫的“平凡人”；没有选择权的“废物”以及深海里的“浪花”。通过这些定位可以清楚的看出《后浪》的青年身份话语普遍使用积极情感态度词汇建构了阳光向上的青年形象，体现了欣欣向荣的时代特色，整体上呈现正面形象。对于评论话语来说，样本中提炼出的四种形象定位，普遍处于消极态势，不管是对视频本身的评论还是对于视频中青年话语的形象建构都处于劣质地位，甚至处于竞争之中。

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值得思考讨论，下文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 4 《后浪》的话语实践分析向度

话语实践是费氏三维框架理论的中间一环，承担着衔接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的中间作用。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费尔克拉夫将话语实践定义为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在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话语类型、话语模式下都会发生变化。上文概念若放在媒介生产内容的框架很好理解，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媒介的内容生产要受到一系列的制约，微观层面从媒体内部“把关人”开始，宏观层面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所以，分析特定话语实践文本，有助于了解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

除了媒介生产内容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制约方式，这就使得“文本生产者”的概念变得愈发复杂多变。而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题思路，即将任何一个话语的文本生产者拆解为一系列的位置，这些位置也许归属于同一人，也许在每个位置上都有人各司其职，这即是探究文本生产者的意义所在。

同样，文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消费。这一部分涉及文本的解释工作，不同的消费主体对于同一文本的消费存在可变结果，既具有话语类的也具有超话语类的，有些文本消费结果直接导致实际行为的变化，而有些则改变了固有意识形态，突出了文本的“力量”。文本的分配同样存在简单分配和复杂分配的区别，不同领域也存在不同文本的分配模式，例如在政治领域，政治领导人在发布会上的讲话，即生产出来的文本将首先被媒体领域内化为新闻报道发出，其次原文本将会以内部学习资源的形式下发至各个下属政治机关，最后，原文本也可能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谈论或讨论，此环节中存在多个“接受者”和“生产者”。这一过程也许是固定的也许是非固定的，特定话语将对应特定的分析形式。

就以上话语实践过程而言，文本的生产和消费归于特殊情况的“社会认识论”范畴。产生和解释过程双向受到社会制约，这些制约有些被内化到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之中很难被察觉，而这些社会制约也是在过去的话语实践和话语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探究二者联系性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

能够最直观最有效的分析上述问题的方法或思路则是《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互文性，也是本文第四章最主要的分析方向，所以在这里就互文性展开简单介绍。

“互文性”术语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克里斯多夫提出的，是在巴库廷的学术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的概念。大致上，互文性是指所有的语词表达，即存在于任何领域、任何类型、任何形式的表达，都回溯性的指向从前的话语生产者那里，并预期性的指向后来的话语者的可预见性的表达，即所有现在当下表达的词语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会戛然而止，它必定是从过去到将来传播链条中的一环，是一种文本的内在历史性。<sup>①</sup>

互文性概念直接指向文本的生产，指向一个新兴生产的文本是如何改变过去的文本，又是如何重构现存的文本、习俗和规则。文本生产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确是有条件的，这时霸权与互文性就建立了关系，探究权力关系下和文本生产是如何构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在这个过程中体会话语竞争和话语重建的斗争过程。除了上述回应或结合其他文本之外，互文性还与风俗习惯、行为种类、风格文类等等存在复杂的潜在关系，建构的过程即形成话语秩序的过程。巴库廷认为：“文本不会以相对直接的方式对过去的风俗习惯加以利用，而是通过例如模仿性的、虔诚性的以及讥讽性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强调或者混合。”<sup>②</sup>

#### 4.1 《后浪》文本的生产——粘贴

从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中的互文性介绍向前追溯到吉拉尔·热耐特的《隐迹稿本》，发现很早就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互文性手法，即共存关系和派生关系。第一种共存关系指的是甲文出现在乙文中，按照有无标识将此类互文手法进一步分为引用和抄袭；第二种派生关系也被称为超文手法，指的是甲文通过重复和转换的形式出现在乙文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具体做法的不同将其命名为戏拟和仿作。以上两种分类方法是互文性常见的手段，但是，结合本文《后浪》文本，由于文本互文的模糊性，并没有具体发现可回溯性的甲文出现在乙文（《后浪》）中的情况，更无法对于甲文的重复和转化做出相应的互文性研究，故本章节将采用第三种互文手段，即“粘贴”来分析《后浪》文本，这一互文手法更符合《后浪》文本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有必要对第三种互文性手法——“粘贴”进行简单阐述。

<sup>①</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sup>②</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在吉拉尔·热耐特在《隐迹稿本》中提出,“一篇文本对另一篇文本的吸纳就是以多种形式合并和粘贴原文被借用的部分。”<sup>①</sup>要区分合并和粘贴的现象既要考察互文本身的创作机制,也要注重文本的互异性。那么,合并则指甲文或多或少的以隐蔽或直白的方式被纳入到乙文中,目的在于丰富乙文内容。根据有无明确的标识可以将合并进一步分为建立、暗示和吸纳。合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于甲文的借用,不论是明显标注还是完全隐含,致力于达到完全吸纳甚至是融为一体的效果,强调互文的整体性。那么反之,在具体的粘贴手法中,主体文本不再力求吸纳甲文,而是将准备借用的部分与主体文本并列,突出其独立性和互异性。针对《后浪》的视频定位,“粘贴——资料合并”为互文性分析提供了绝佳视角。

《后浪》视频可以拆解为两部分构成的话语研究对象,一部分是图片话语,另一部分是文本话语。经过统计,整体视频全长3分53秒,其中图片整体占据视频时长2分01秒,文字独白整体占据视频时长1分52秒。从时间占比来看,图片素材混剪部分在视频中占有相当比例,故本节偏重通过互文性手法研究图片话语部分。

时长2分01秒的图片混剪部分属于《后浪》图片话语的互文结构。如果将《后浪》作为文本生产的受文那么图片混剪则属于图片话语的底文部分。这些图片全部来自于过去B站各个up主发布的视频,《后浪》的文本创作者通过筛选将图片素材进行简单的拼贴合并,整体上并没有将这些被引用的图片融入受文,也没有进行彼此之间的相互吸收和叠加,二者被明显的隔开,成为独立而分明的段落,视觉上突出了互异性,从而使得合并成为了文本的结构本身。

具体到每一帧图片上。在2分01秒总时长的图片合集中,共出现了45位青年形象,其中大多数为B站影视、娱乐圈up主,只有3帧画面出现了医护工作者的形象。但是本文探讨的互文性并非每一帧画面的效果,而是它们在被合并粘贴之后的总体效果。所以,必须将互文性放在两个层面进行思考,即将图片混剪话语结合《后浪》文本话语进一步分析创作效应。我们将通过以下四个例子来分别说明。

<sup>①</sup>(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 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图4.1



图4.2

图4.1是《后浪》00:30的截图，图片来源于数码区up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图片展示的是up主何同学正在试戴VR眼镜的场景，此时的《后浪》文本传达出“科技繁荣和文化繁茂”的态度。那么从底文出发，“老师好我叫何同学”作为科技文化传播的青年up主代表，始终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努力拍摄高质量视频，不断接触前沿科技，探索科技创新，为梦想扎牢根基。不论是从专业技术还是价值观层面都值得现在年轻人学习，这也是《后浪》创作者认可和继承了up主的传播内容和观念，从而选取他作为混剪中的一员。

图4.2为视频01:49截图，图片来源于音乐区up主“古琴诊所”，展示的是我国晚唐时期的音乐文化，配图文本为“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古琴诊所”同样是一群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年轻人，他们身着中国古典服饰，运用古琴、古筝、哨笛等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各式各样的乐曲，画风可爱幽默轻松，赢得了网友的一致敬佩。创作者也正是欣赏他们的创作才华和传承精神，将其纳入混剪。



图4.3



图4.4

图4.3为视频01:53截图，图片来源游戏区up主“FPX电子竞技俱乐部”，展现了2019年团队获得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时的胜利场景，相应配图文本为“你们把你们热爱的变成了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快乐的事业”。“FPX电子竞技俱乐部”是一群热爱游戏，并以游戏为职业的青年团体，他们不仅有幸从事着自己热

爱的职业，并且能够将这一份热爱和快乐分享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也曾经经历不为人知的艰苦岁月，最终才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传递出现代年轻人不怕失败、勇往直前、追求热爱、分享快乐的精神。

图4.4为视频00:57截图。图片来源于up主“低调上传”，图中小朋友正在展示拿到“B站十万粉银电视”的奖牌荣誉，相应配图文本为“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up主“低调上传”是一位年仅十一岁的小学生，视频主要展示up主自己的日常生活，凭借沉稳的讲话风格和憨厚的外表仅用半年时间收获14万粉丝。视频创作者正是看中现当代青少年从小明确兴趣爱好，不断摸索前进的精神，符合《后浪》的基本定位，将其纳入混剪部分。

通过对以上四张图文的介绍，分析如下：

第一，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后浪》与图片原型始终保持欣赏态度。互文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作品与原始模型或已有的原型所保持的关系。按照古典的观念看，图片合集相当于原始模型，《后浪》则作为被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存在，那么《后浪》的创作者在引入了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方式下依然延续了过往up主拍摄的视频，并将它们合并粘贴，通过文本的表达追随延续前人的作品，使他们达到原本想要达到的目标；以迪贝莱的观念来定位，二者的关系即为“欣赏”，它包含了对原始模型的尊重，但绝对不是服从，新的文学创作是在追随过去的模型并不断从各个层面创新，在过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将新的文学创作抛入时代中，它所代表的是时代精神的延续和新时代的更新。所以，《后浪》一方面延续了过去人们对于青年的身份建构，尊重青年价值观；另一方面《后浪》也在新的背景下衍生出更符合当下环境的意义，将其原型融汇于中、为己所用。

第二，从创作的视角来看，《后浪》的图片互文性创作具有集大成效果。《后浪》采用了粘贴——资料合并的方式将一系列的图片简单拼接，并不与受文融合且成为独立的部分存在，表面上只是一个个间断性的、不连续性的图片单元，实则拼接起来却是一副展现中国青年面貌的画卷，一个多元而分散的开放式互文取得了1+1大于2的效果。每一个混剪中的up主所代表的领域、行动方式以及方向皆不相同，性别、年龄也彼此悬殊，但是他们加起来就是中国青年的样子，他们共同展现的是青年人的热情和积极，共同传递的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的生活热情，构建了热血向上的青年形象。显然《后浪》图片的粘贴式互文手法创作取

得了良好的建构效果。

第三，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后浪》的互文结构传递了文学记忆。蒂费纳·萨莫瓦约认为，“互文性是技术和客观的结果，它是记忆文学作品的结果”。<sup>①</sup>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浪》是在延续前人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创作出来的。“后浪”一词来源于“长江后浪推前浪”，比喻新出现的、有一定积淀积累的人事物推动旧的人事物的在某些方面的不断发展，也可指有一定资历的新人新事胜过旧人旧事。最早出自古训《增广贤文》中“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另外也追溯到宋·刘斧《青琐高议》：“我闻古人之诗曰：‘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以上出处皆被称为“后浪”的文化记忆，显然，在《后浪》文本中，文本生产者延续了旧文中新人推动旧人的含义，并结合现代科技的进步、环境的开放以及思想的解放，使得现代新人可以更快的向前走，不断超越后人，通过这种互文手法告诉我们《后浪》的价值传递完全来自于古训，外界环境的变化从未影响从古至今的价值观，今天的作品也是追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

## 4.2 《后浪》文本的分配

经过话语实践的第一阶段后，通过特殊方式和规则建立的文本将进入到分配阶段，即“互文性链条”范畴中。费尔克拉夫认为：“有些文本具有简单的分配方式——偶尔的谈话只属于它所由之发生的当下的背景环境，而其他文本有着复杂的分配方式。”<sup>②</sup>就《后浪》的分配过程而言，主要从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以及人际传播四个阶段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及传播效果进行剖析。

首先，大众传播阶段是《后浪》文本分配的起点，2020年5月3日下午17时，B站联合7家媒体首次发布了《后浪》视频，这是一次面向“90后”“00后”青年群体的青年节献礼策划，随后，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原文转载，人民日报、公安部新闻宣传局等官方政务号也进行了原文转发，各大高校的B站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号也纷纷跟进，瞬间实现了多渠道、跨平台传播；该视频还于当日18时48分，登陆CCTV1，在《新闻联播》播出前两分

<sup>①</sup>(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sup>②</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钟放映,形成了一定的传播规模。五四青年节当天,各类区域主流媒体持续跟进,联手策划了一起“媒介事件”。在此过程中,包括了多种传播形式,首先是各大媒体的原文转发,指对原文不附带任何评论,只进行转载的行为;其次是转载附带评论的形式,这种传播形式较为常见,尤其是B站各大高校官方账号,例如“上海大学”转载的同时附带评论“奔涌吧!”以表认同;最后一种则是《后浪》的衍生物,传播内容并没有直接对原文进行转发,而是直接对其进行评论,以此达到宣传效果,例如在《人民日报》《奔涌吧!时代大潮中的青年“后浪”》一文中,发扬原视频中对于“后浪”的定义以及意识形态,并且以评论的方式更进一步的诠释了“后浪”的定义,延续了价值体系。大众传播虽然具备传播范围广、信息可信度高、认知层面影响力强等特点外,但仍旧遵循中心化的单一传播模式,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常常处于缺失状态。

其次,《后浪》进入到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阶段,覆盖面缩小、权威性降低,但是在态度改变和行为改变层面都具有显著的效果,其中群体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对受众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隋岩认为,当今媒体环境已经进入到了“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群体传播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扩散式传播,传者和受者始终参与传播过程,不断建设新的传播渠道,传递各异的意识形态。依托社交媒体逐步出现的网络社区意见领袖是社交媒体时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兴力量,他们往往善于发现社会信息,乐于分享自己的观点,善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用户互动,并在此过程中影响其认知、态度甚至是行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已然是新媒体时代不容忽视的传播力量。在《后浪》的传播过程中,各大平台的意见领袖附带评论转发视频,引起热门话题的讨论,不断发布原创文章或与视频互动表达个人观点。例如在“后浪”的概念传递和文化实践方面,B站百大UP主“朱一旦”发布了《非浪》视频,代表了除“后浪”以外的、没有优渥条件的、朴实无华的年轻人的诉求,该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受到广大网友的追捧,认为《非浪》更符合当代大多数年轻群体的处境,传递的价值观也更贴近自身,网络用户在《非浪》的引导下快速形成反《后浪》群体,抵制主流价值观,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可见,由于意见领袖的引导使得主流的价值传递和文化实践出现了偏差。

组织虽然属于群体的一种特殊形式,但组织传播有别于群体传播,它在《后浪》的整体传播过程中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费孝通在《社会学概论》一书中认

为：“构成组织的五个条件分别是：经过挑选的人员组成的互相依赖、彼此合作的集体，固定的目标，具有规范性的组织章程，一个权威的领导体系，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设备。”<sup>①</sup>从传播特征而言，组织传播相较于其他四种传播形式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流程清晰、传播效力强等特点，这些特点得益于组织的特殊架构，所以“组织传播是有共同目标、有指挥管理、有责任分工的团体协作行为，信息多为指令性、宣教性和劝服性内容，沿着从组织核心到内部成员的路径进行传播。”<sup>②</sup>具体到《后浪》案例中，组织传播仅仅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教学行为中，例如2020年5月6日，十堰市郟阳中学官网发布了学生的《后浪》观后感，这是一次学校统一组织领导下的、以学生为传播主体的组织传播行为，在此情境下通常不会出现反主流现象，并且能够完全接受原文本的意识形态。

最后，web2.0时代的人际传播阶段也是此次话语事件传播的重要环节。新媒体中的人际传播，可简称NMC (New Mediated Communication) 人际传播<sup>③</sup>与传统人际传播相比更突出自由性和灵活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交流传播权的掌控，正因为NMC人际传播的存在，打破了大众传播的垄断，所以对新媒体时代下的人际传播考察才显得更为重要。就《后浪》人际传播过程来看，微信是其发生的主要渠道，由于微信的传播者具有实名性、传播内容具有私密性，并且以点对点的方式传播；朋友圈也是基于强连接、强关系为主的虚拟社区，所以整体上来说具有传播速度快、效率高、可信度高等特征。在《后浪》的人际传播过程中，也同时存在原文转发、附带个人价值观评论的转发以及依附式原创三种传播形式，在视频宣传和价值观传递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传播效果。

关于《后浪》的文本分配过程并非唯一单一模式，以上四种传播模式总是同时进行，传播形式并驾齐驱实现了效果最大化。在多种传播模式结合的文本分配互文性链条中，文本类型的相互转化具有发散性特征，“后浪”视频或概念被延伸为各种各样的文本类型，这些文本类型便成为了被意义殖民化和入侵的通道，沿着这样的通道，文本类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被争夺的对象，这就是用来解释“后浪”互文性链条的方式，教育、社会服务和媒介中的文本都被殖民化了，都投入

①费孝通.《社会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②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14-134+204-205.

③项国雄,黄晓慧,张芬芳.新媒体与人际传播[J].传媒观察,2006(04):32-34.

了“后浪”的意识形态，投入了新的青年身份建构。

## 4.3 《后浪》文本的消费

### 4.3.1 连贯性

文本的消费过程即文本的“解释观”，“连贯性”也是解释观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连贯性是解释者给文本附加上去的一个属性，文本对于滞后属性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所以它并不是文本的自身特有属性，它的出现需要不同解释者就同样的文本内容进行不同解读，即生产不同的连贯性文本。同理，连贯性也没有固定的逻辑要求或思维定势，不同的解释主体根据不同的背景、语境以及意识形态产生多种连贯性文本，这些文本具有正确的现实意义，并不互相矛盾，也没有绝对正确性。

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解释者能够参透文本的互文性以及预先假设，了解文本生产的环境，在此基础上便能够准确解答原文本的意思，适用于文本中特设的位置信息，我们将这种解释者称为“顺从型”解释者；与之相反存在第二种情况即“抵抗型”解释者，我们不能片面的认为抵抗型解释者就是故意或有意曲解文本的意思，而是在特定的话语过程中，每个话语主体具有自主的，特殊的，累积的社会经验，形成了自设的特定意义空间，所以只能在能够支配的范围内进行意义解读，但是抵抗型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文本的互文性联系，可以说，抵抗型解释者是反对互文性要素霸权的一种斗争形式，也是体现意识形态效能的方式。

根据以上描述，本文认为，由于《后浪》话语被置于新媒体的研究框架之下，所以它的话语消费行为也随之变化。此案例中，解释者为观看《后浪》的网络受众，消费行为包含点赞、转发、评论、转推等一系列的形式。与传统的话语形式不同，传统的主体控制和话论转换一般指访谈或者对话，而B站拥有新媒体强大的原创互动机制，将传统的形式转变为转发和评论，具有即时交互性的同时也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来回切换，任何文本都可以被生产、传播以及消费。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评论相较于转发数量更好抓取且相对稳定，具有参考价值，所以本小节的研究对象即为评论文本。

根据Alfred数据室抓取的30666条评论, 对其进行情感极性分析, 发现B站用户对该宣传片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积极的。这里所说的积极正面的评论则是由顺从解释者发出的, 这是就他们适应于文本中所设定的位置而言的。但是, 并非所有的解释者都是顺从的, 仍然存在抵抗解释者, 这也是本小节研究的重点。

首先, 就抵抗解释者的主体身份来说, 几乎所有的抵抗解释者都是个人注册账户。在作为个人主体的话语生产者方面, 话语生产者主体所处的生存环境、社会资源、社会经验以及对生活的不同定位等变量影响了他们解释特定文本的方式, 也就出现了与原文本表达不同的理解, 抵抗型阅读已经脱离了文本的互文性联系。

其次, 连贯性对于某些假设也具有依赖性, 是解释者们将这些假设带入到解释过程之中的。例如, 在《后浪》原文本中“我看着你们, 满怀羡慕”, 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样的假设: 相比较上一辈的年轻人, 新一代的年轻群体拥有许多上一辈年轻人无法拥有的东西, 物质也好环境也罢, 总之是积极的拥有, 所以才使得上一辈人满怀羡慕。但是, 对于抵抗型阅读的话语生产者来说, 假设与假设之间发生了冲突。例如, “讲的很好, 可惜不现实, 听听也就算了”, 此话语生产者的假设与原文假设发生了冲突, 他并没有顺延和保持原文连贯性, 而是切断了连贯性, 跳脱到另一种假设之中, 导致原文所传递的信息和价值观不被认可, 这就使得解释者产生了抵制性的意义。

最后, 连贯的解释能够跨越文本的具有互文性意义的各种不同要素, 这种解释的产生同时也是为了它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意义, 即观念的意义和人际的意义。例如, 不论在《后浪》原文中还是评论中, 都含有复杂的关系意义, 这些意义与他们能够将异质的风格和文类结合起来的方式有关, 正是解释者们发现了将这些不同的关系意义结合起来的、可被接受的方式, 在积极话语中, 将相关的意义结合起来, 这一方面使得信息提供者与被动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和谐一致, 另一方面是使普通生活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谐一致。而在消极话语中, 信息的发布者与被动接受者之间的意义关系显然不一致, 而且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身份意义出现分歧, 身份认同出现裂缝, 导致身份的矛盾性, 从而不会得出具有连贯性的意义。

### 4.3.2 拼贴/同构

上一小节的分析仅仅将研究对象规制于《后浪》的评论文本中，而对于《后浪》视频的消费过程来说远远不仅限于此，各种各样的文本类型均体现在消费过程中，由于在B站平台的消费过程更具有青年文化代表性，故本小结案例分析将主要围绕B站的原创作品展开。

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的三种符号解码论早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基础范式，他认为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符号意义的生成会根据受众自我认知系统的改变而改变，这时就出现了三种解码立场，分别是“主导——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费斯克接过霍尔对抗式解码理论的接力棒，提出了第四种解码——“创作式解码”，这种解码理论更加强调受众的积极能动性，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生产者式的文本”，其价值体现在受众可以积极参与意义的构建和传播。在过去，创作式解码只是批评家的特权，而在web2.0时代下的今天，UGC(User-created content)将权力无限下沉，人人都可以进行创作式解码，积极参与文化的制作和传递。

B站作为UGC的代表平台之一，推出的“bilibili创作激励计划”和“充电计划”，不断鼓励用户上传原创视频，平台的技术保障和规则政策的支持使得当今网络用户不断进行创作式解码，进行意义创造，打破霸权僵局。B站用户在对《后浪》进行创作性解码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深受追捧的原创视频，例如朱一旦的《非浪》、献给饭友们的演讲《后厨》、续集《后腿》等等一系列关于《后浪》的戏拟和仿作，从创作风格和生成思路来看这是一次符号的游击战，其研究重点并非符号本身，而更关注这些符号如何被使用，将会形成怎样的风格。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风格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式的隐喻”<sup>①</sup>，产生模式有二，第一种是将现有的话语体系进行挪用和篡改，从而生成一种新的符合自我认知的意义，这种对现有物品挪用的方式被称作“拼贴”；第二种是对象征结构性的复刻和翻版，这种方式被称作“同构”。

与来自列为·斯特劳斯和费斯克界定的拼贴概念有所不同，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文化的拼贴采用和盗用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产品，在《后浪》视频中，游戏

<sup>①</sup>胡疆锋. 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D].首都师范大学,2007.

的事业、极限运动挑战、前沿科技的探索等等符码构建的“后浪”身份对于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群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混合了其他语境的意义来改变本身的意义,比如在《或许,这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后浪”》视频中,UP主混合了新的语境意义和实践意义构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后浪”,形成了新的文化风格;同时这种形式的拼贴产生了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效果,它对于原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进行了利用和转换,在自己的语境下创作出新的话语来回应周围的世界;另外,上述特征均与大众文化或主流文化存在联系。青年文化的拼贴和盗用体现了一种对现存社会结构的回应,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风格,正如费斯克等人所说的那样拼贴有一种“颠覆功能”,“借助这些功能,主导文化或者天然文化的元素被赋予新的批判性意味,并且被冷嘲而怪诞地并置在一起。”<sup>①</sup>

同构不同于随意的拼贴,同构是指“某种结构的复制或翻版”<sup>②</sup>,是一种基于象征符号的集体认同。威力斯认为,文化创建者的主体经验和所要表达的符号之间是相吻合的,同构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青年文化拥有不同的风格,为什么每一种青年文化拥有特定风格的问题,正如在《后浪》视频中,科技、游戏、音乐、旅行等等象征符号完成了积极乐观的青年群体身份建构,这是在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当代青年身份的复刻;而在受众解码的评论中或衍生原创作品,作业、泡面、工地等话语建构了与视频中截然不同的青年形象,这些名词恰当的描述了“非浪”青年的日常生活方式,突出了青年群体的不稳定性和不安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种类似“打工人”“社畜”等的描述形式与“非浪”青年群体身份建构之间具有同构关系,这对青年亚文化风格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其中还隐含着对主流文化的批评和对社会结构的挑战。

①(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第二版

②(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第二版

## 5 《后浪》的社会实践分析向度

本章的分析架构是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理论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即社会实践向度分析。由于费尔克拉夫继承了福柯的权力核心，那么第三个向度的分析重点则聚焦于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在上文提到，文本生产受到社会秩序、语境的制约，而秩序和语境全部都是权力运作的产物，所以，探究话语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才能深入透视原因。在文章的第五部分，基于前文《后浪》文本的青年身份话语建构、话语的生产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借助福柯的思想，探究背后的权力结构，发现社会变迁和文化迁移。

米歇尔·福柯始终将话语中的权力作为他思想的内核，这就使得费尔克拉夫也同样认定社会文化实践的研究重点在权力上。具体来说，是指在权力观的视角下透视话语，跟踪话语作为一种霸权斗争的演变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关注意识形态的渗透。费氏霸权观是基于20世纪阿尔杜塞和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进化而来的，他认为，在宏观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和意识形态中，霸权占据领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不过这种霸权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最初是由于资本的力量获得权力，慢慢与其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形成联盟组织，甚至是让步于意识形态再与之联盟从而达到统治领导地位。话语实践和话语斗争同样属于权力的斗争过程，一个话语，不论是基于互文性视角还是话语秩序视角，都折射出背后的话语权力。费尔克拉夫认为，在对话语进行社会实践向度的分析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应该是放置于首位考虑。在话语实践分析中，他提到了话语生产的影响因素，明确了话语的生产受到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以及各类风俗习惯的制约，同时话语表达的意义，产生的意义和理解的意义又不仅仅限于交际环境和社会语境，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权力关系。可见，权力关系决定着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制约话语的生产、分配、消费的一系列实践行为，不同的话语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也不尽相同，所以，探索话语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清社会变迁。<sup>①</sup>

### 5.1 媒介资源的争夺

2004年3月，web2.0在O'Reilly Media公司和Media Live国际公司的一次头脑风

<sup>①</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暴会议上被首次提出, Tim O'Reilly在2005年9月30日发表的《What Is Web2.0》一文中概括了Web2.0的概念, 并给出了描述Web2.0的框图, 如此, Tim O'Reilly也成为了Web2.0的代表人物。<sup>①</sup>在此之后迎来了Web2.0从理论到技术的迅速发展。

Web2.0时代的到来, 打破了Web1.0时代信息技术环境的僵硬和固化, 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变。从信息传播目的来看, 从满足尽可能多的受众的共同需求到尽可能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从信息交互方式来看, 实现了从网站用户到群体、内容的P2P传播模式的转变; 从信息组织方式来看, 从单一的自组织转变为多元的他组织和协同组织; 内容创建主体也从固定群体发展到任何人; 创作技术门槛不断下沉, 扩大了参与主体, 出现了多元话语。<sup>②</sup>推动了从传统媒介时代到网络传播时代的迈进。

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媒介资源被单一垄断的局面, 受众可以单纯的从技术层面对媒介霸权发起冲击。首先, “一系列基于网络或移动网络的交流平台和媒介技术为受众参与和分享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受众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参与行为, 体现为积极利用网络技术的互动性。”<sup>③</sup>截止2021年5月1日, B站平台《后浪》视频累计播放量3192.4万, 点赞数178.6万, 收藏94.7万次, 转发116.1万次, 28.4万条弹幕以及66126条评论。就数据而言, 受众在一定层面上打破了媒介单向发布信息的霸权模式, 积极利用点赞和收藏向原视频反馈观念态度、利用弹幕和评论参与实时讨论、利用转发功能进行二次甚至多次传播, 这一系列基于技术的互动传播行为转变了受众身份, 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媒体权力。

技术层面的媒介权力争夺更多的体现在文本的分配过程——“互文性链条”中。2020年5月3日17点, B站联合7家媒体共同制作播出了《后浪》视频, 随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相继转载; 当日18时48分, 《后浪》登陆CCTV1《新闻联播》前黄金时间段, 该视频一经播出立刻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至此, 该视频从发布到推广, 主流媒体始终掌握着媒介资源, 垄断了传播渠道及传播内容。而受众开始反抗媒介资源霸权, 具体体现在受众个体对新媒介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罗杰斯认为: “创新推广的最佳途径是将信息技术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应用。”<sup>④</sup>所以, 经过主流媒体在大众传播范围内的推广扩散阶

①Tim O'Reilly. What is web 2.0[Z].

②王伟军, 孙晶. Web2.0的研究与应用综述[J]. 情报科学, 2007(12): 1907-1913.

③陈霖. 新媒介空间与青年亚文化传播[J]. 江苏社会科学, 2016(04): 199-205.

④(美)埃弗雷特·M·罗杰森. 《创新的扩散》[M]. 辛欣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6

段，视频下沉后的人际传播才是争夺媒介资源的关键。在B站平台，具备可观粉丝量和传播影响力的“百大UP主”作为平台“意见领袖”相继转载该视频，用户通过弹幕、评论等互动机制积极参与，使得该视频极短时间内登上了站内排行榜首位；在知乎平台，许多资深用户贡献出新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部分年轻人对B站《后浪》的消极态度？”、“B站的《后浪》，让人心里有火气”以及“如何看待B站献给中国年轻人何冰演讲《后浪》？”等等，用户围绕新问题迅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千万浏览量、数千条回答以及上万点赞数将有关《后浪》的问题讨论迅速推上了知乎热榜，截止2021年5月1日，知乎平台《后浪》累计讨论数7.2万个。平台“意见领袖”的问题贡献结合用户参与提问的讨论机制，使得该视频快速传播并达到高潮；在微博平台，截止2021年5月1日，#后浪#的超级话题累计阅读量2.6亿，讨论8.5万次，基于《后浪》的原创人数1.9万人，其中包括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例如“孔玮老师”、“耿向顺”、“高庆一”等等众多具有微博影响力的用户，他们积极参与#后浪#话题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粉丝可直接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的方式实时反馈意见。“意见领袖”作为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介入了大众传播，分割了媒介资源，加快了视频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效果，与此同时，信息传播中夹杂着个人情感及意识形态，影响了大众的价值判断，左右了传播方向。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扩大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还实现了跨平台传播，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精准度。微信作为web2.0时代最成功的新媒体产物，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属性，一定程度上争夺了媒介资源，凭借自身独特的平台优势实现了强关系传播。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一键转发”功能为跨平台人际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后浪》从B站分享到微信朋友圈，或微信朋友都可以轻松实现，而微信平台提供的实时评论、点赞以及转发功能为N级传播提供了技术保障，展现了互动形态的多样性。不同于微博，微信圈内的社交关系更多的是基于熟人关系，更具有亲密感和认同感，所以传播质量、效率、交互频率以及传播内容的效度和信度都会大大增加。

其次，在内容层面，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UGC(User-cre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打破了Web1.0时代的媒介霸权，将部分传播权移交到了用户的手中，实现了受众角色的转变，同时也更新了信息的生产模式。许同文认为，在Web2.0

时代, UGC包括五种模式, 分别是目的在于自我表达的“表达模式”; 产消双方进行充分互动的“互动模式”; 为使大众获得真相, 多个受众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内容生产的“协作模式”; 在他人引导下完成内容生产的“引导模式”以及集上述四种于一身的“交叉模式”。在《后浪》的传播过程中, UGC在受众是否认可其传达出的价值观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表达模式而言, 《后浪》一经发布, 意见领袖在个人账户端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 例如微信公众号“缓缓说”发布的“《后浪》背后的残酷真相”, 作者就《后浪》的内容及价值观输出进行了自我表达。最直观的表达模式体现在人人都可以在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平台发布内容, “表达模式”可视为受众传播链条中的基础。互动模式是《后浪》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重点体现在微博平台#后浪#的超级话题以及B站平台的弹幕及评论, 受众就特定内容进行充分的讨论互动, 在互动过程中传播内容输出价值观, 完成内容生产。引导模式在此次传播链中可分为平台引导和个人引导。平台的跟帖、点赞、转发等结构功能设置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完成内容生产; 而“意见领袖”的个人引导是此次话语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 B站平台朱一旦的《非浪》、知乎平台的“被《后浪》定义的优质年轻人, 可能不到2%”、微信公众平台万星人的“你也配当后浪?”等一系列受众生产的爆款内容引导了大众舆论, 提出了质疑的声音, 掀起了反对主流的巨浪。

整体来说在《后浪》的传播过程中, “交叉模式”占据主体, 实现了用户生产内容从点到面、从面到面的传播规模, 有效输出了各种角度的意识形态, 传递了不同声音, 瓜分了媒介资源, 形成了传播影响力。

综上, 在web2.0时代, 技术的支持和受众内容的自主生产,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媒介资源霸权, 实现了话语民主化。但是, 从大众传媒发布《后浪》的起点来看, 后续的传播过程其实是受众对大众媒介霸权的快速反应, 实际体现为一种被动的反抗模式。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web2.0环境下, 受众消除了明显的媒介资源权力关系, 但实际上却转入了隐形的霸权。

## 5.2解释权的争夺

起初, Bilibili联合的7家媒体由于发布媒体和发布渠道的权威性, 在主流意识形态归属下霸权了对“后浪”的解释, 在延续了传统文化对“后浪”的定义后,

新时代下结合新社会表征将“后浪”定义为拥有更多资源更多机遇的年轻人为热爱不懈追求、为祖国添砖加瓦、为新青年正名的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青年形象，传达出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此番对于“后浪”的解释霸权一度达到了意识形态高度自然化的程度。但随着视频不断传播，受众异质的声音不断累积，开始了对“后浪”解释权的争夺。排除官方媒体的解释，单独从受众角度来看，出现了以下几种解释：延续原有解释并升华、部分肯定原有解释但结合切身实际进行适当调整、全盘否定原有解释并自立新释义。这三种受众对于“后浪”解释权的争夺形式实际上也反映了受众对于视频传达出的意识形态的肯定与否，如存在共通的意识形态，则能够顺理成章的理解吸纳原文对于后浪的定义，若与原文意识形态存在出入则会出现后两种情况，并对外传递个体的意识形态。综上，对于“后浪”解释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与意识形态的争夺对等，争夺的过程也是重构话语结构、重建话语秩序的过程。

### 5.3文化的博弈

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实践观中，话语被定义为社会实践的一种语言形式，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含义。首先，话语是与世界产生彼此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行为模式；再者，话语与社会结构存在内在辩证关系，一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话语受到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影响，并深深根植于真实的、物质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话语对社会结构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建构效能，主要包括主体社会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所以，“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sup>①</sup>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中心角色，具有反应社会现实、表征社会文化的功效。那么，在此次以B站《后浪》为代表的网络青年话语事件中，用户的话语表达不仅局限于个人表述，还建构了青年群体身份，凸显了青年文化，反映了社会变迁。

在《后浪》的传播过程中，不论是基于语言学的文本向度分析，还是探索传播过程的话语实践分析，都显示了新媒体时代下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博弈，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解码主流文化，反向身份建构。鲍德里亚认为：“对大众具有先在性

<sup>①</sup>(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和强势力量的主导意识形态制造出一个话语体系和交往系统,形成一个符号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导意识形态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的过程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sup>①</sup>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的渗透使得符号成为了具有客观意义的媒介体系,媒体通过对符号的编码,真正实现了对社会成员意识形态的霸权。但是,受众早已摆脱了“魔弹论”定义下的被动定位,掌握了信息选择与信息反馈的主动权。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认知、知识体系各不相同,他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过程即对文化的解码。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结构差异,这其中蕴含着意识形态操控和媒介文化霸权。

三个“假象的立场”被霍尔用来描述各种解码过程。结合《后浪》话语事件发现,受众对主流文化的解码过程主要包括协商式和对抗式。在协商式解码过程中,受众认同并接受《后浪》抽象意义的主流文化及意识形态,但从视频制作、文本写作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对细节的抵抗。这一过程混合了控制与开放的双向运作,一方面体现了主流文化的霸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受众解码主流文化,开放包容的过程。而在对抗式立场下,受众采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或相异的认知框架解构同一媒体文本,虽然主导媒体拥有对文化的优先解读权,但是并非所有受众自愿顺承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做出媒体预期的反应。抵抗式解码在《后浪》评论文本以及后续的话语实践中均有所体现,表达了对主流文化的强烈抵制,具有批判的感情色彩。

从文本层面来说,受众在接触《后浪》传递出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后,在自我认知意义空间内,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后浪》的质疑和否定,解码了主流文化,建构了贫穷的“打工人”;迷茫的“平凡人”;没有选择权的“废物”以及深海里的“浪花”的青年形象,与《后浪》建构的积极向上的青年身份定位相反。

第二,拥有独立的符号体系,对主流文化进行仪式化和风格化的抵抗。青年通过对主流文化的解码构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这一构建渠道主要是指对主流文化的“转换、借用、肢解、恶搞”。<sup>②</sup>费斯克认为解码是消费者对主流文化产品的积极行动,是对霸权的一种抵抗形式,相比起“解释”来说更能突出

<sup>①</sup>刘玲华.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26-32.

<sup>②</sup>杨聪.浅析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05):53-56.

主观能动性，他宣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并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使用者完全有权力亦有能力将商品改造为自己的文化。”<sup>①</sup>他发展了霍尔的第三种解码模式，提出了创造性解码理论，更关注受众接受信息的能动性以及对个体身份的建构，对于互动性文本的接受是基于个体自身环境、自我认知、知识体系、情感需要等方面从而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对主流文化产品做出有意义的诠释。在web2.0时代，人们对信息的利用已经深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创造性解码不再是批评家的专利，符号系统是文化传播的基础，语言符号则是文化传播最直接的工具，为了区别主流文化，青年群体作为新媒体时代用户主体，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制造出属于青年圈层的独有符号体系，以此彰显自身独特的身份和个性。

就《后浪》评论文本向度来看，“隐喻”是传播青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符号，喻体的创作来源于《后浪》本身，比如将自己的环境比作“深海”“大海”，将自己角色定位为“浪花”“一滩死水”；还有部分喻体来源于对生活的直接描写，例如用“作业”“工地”象征自己的生存现状，用“社畜”“打工人”定义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用“世界的中心”“奔涌浩荡”来形容《后浪》中的年轻人等等。从话语实践向度来看，模仿《后浪》的戏拟和恶搞创作也是青年人独有的符号体系，例如朱一旦的《非浪》、献给饭友们的演讲《后厨》、续集《后腿》等等一系列由《后浪》引发的创作潮。这一切在伯明翰学派看来皆是对主流文化仪式性和风格化的抵抗，即通过制造属于自己文化的符号体系，表达对当前社会的不满，这种景观性的表象并没有对主流文化做出实质性的抵抗，但是就青年文化本身来说却具有积极肯定的意义。

第三，建立青年亚文化，反抗意识形态霸权。“亚文化”的概念顺应“主流文化”概念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阶级结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非主流群体渴望打破阶级对立，通过建立异于主流文化的特殊语言体系，以群体或集合的名义挑战现存的社会制度，反抗主流文化霸权；在文化人类学中，亚文化是指与社会主流文化或主导性价值观有所不同的一种群体文化。所以，亚文化的形成不但需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构建特有的符号体系，还需要集体认同最终形成群体文化。亚文化的概念最早被用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后来

<sup>①</sup>(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被引入青年文化研究领域。青年亚文化是指青年群体建构出的一种有别于主流价值体系的另类文化，整体呈现叛逆、排斥的趋势，其形成仍旧遵循亚文化的建构体系。

那么，在《后浪》的传播过程中，受众盗用主流文化符号系统建立了新的语言体系，在语言的使用中过多的使用消极反叛情感态度词语，直接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姿态；而在青年群体的反抗过程中，对符号的构建和使用呈现风格化态势，尤其是话语实践部分，通过恶搞和戏拟的手法创作出的一系列的模仿视频，一度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甚至形成风靡一时的“后浪体”；另外，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输的便捷性和互动性能够立刻吸引价值体系相同的个体，快速形成亚文化群体，通过跟帖、转发、讨论、评论、原创等各种形式传播不同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

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对抗现有社会体制，抵制霸权主义的象征性反抗方式，其中蕴含了复杂的产生原因。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将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原因总结为世代和结构两种模式，前者指由年龄差引起的代沟，后者则强调阶级对立引起的社会矛盾。后来，伯明翰学派提出，青年亚文化的形成重点并不在于世代差异，而在于对政治语境、阶层矛盾、经济浪潮以及心理环境的考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原因主要存在自我心理和群体心理两种分析路径。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分化理论，自媒体时代下的网络青年往往同时存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状态，一部分青年在网络世界中做回本我，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羁绊，遵循内心欲望，做出违背传统道德的行为；也有部分青年在现实生活中以逆反青年的形象存在，但在网络世界中完全遵循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达到超我状态，上述差异的形成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革息息相关，青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质性的反抗，只能够在虚拟世界中通过建立社群、创造符号等形式构建本我形象，在心理层面实现本我认同，这一过程消解了现实的主体性和真实性，打破了本我、自我、超我的平衡，以上对青年自我心理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处于青年期阶段的青年，内心和现实往往存在极大的矛盾，所以刻意用极端激进的方式掩盖内心，但是本质上还是希望得到认可和关注。从群体心理角度看，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可能是集体无意识呈现。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基于历史和经验的，甚至比经验更深层的本能性的合集，是一种超越历史和传统的共

同意识,具有长久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由于青年群体拥有许多共同性的心理特征,这些共同的出自本能的创造性冲动和集体情感结合,形成青年集体无意识。”<sup>①</sup>所以,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先天的,在web2.0时代,网络脱离现实因素形成相对真空的对话环境,青年群体可以在其中通过特殊的符号系统区别主流文化,释放真实本我,积极探索自我生存模式,甚至突破道德和主流文化约束,激发出青年群体精神中的无意识行为。近几年来,青年亚文化愈发多元化、常态化,它从本质上体现了青年群体的实质需求,凸显了被压抑的无意识,外加群体的聚集和参与最终形成了青年群体的集体狂欢行为。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sup>②</sup>在我国,创建主流文化的精英群体始终处于社会核心位置,他们通过媒体控制着人们今天看什么、讨论什么、什么话题重要什么话题不重要,掌握着舆论权、决策权和话语权,自始至终对丧失话语权的群体形成压制,构成话语霸权。但是这对处于青春期的、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青年群体来说是压抑和压迫的,他们渴望得到应有的话语权传播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及认识自己的身份,网络媒体的普及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发声交流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在那里,各种类型的亚文化得以快速传播,主流文化逐渐被亚文化占据,移交了部分话语权。当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传播工具时,则更倾向于一种身份的表达和确认。当代青年主要以戏拟、拼贴、杂糅的方式表达自我的诉求,创造符合定位的符号体系,以反抗的姿态与主流文化对话,他们也只是在网络中抒发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不同态度,与主流媒体划清界限。

概括地说,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立足弱势群体,对主流文化积极的反抗形式,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来看,青年亚文化体现了青年群体的认同危机,“认同是个体对自我的身份确认,是代表青春期自我的最重要成就。”<sup>③</sup>当处在自我探索阶段的青年群体发生矛盾和困惑时,他们往往不愿采取积极正面的解决办法,违背共同性另创价值体系,从而达到反对主流彰显自我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取得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青年亚

①李雪.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2.

②胡疆锋.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J].新疆社会科学,2008(01):108-112+138.

③(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

文化只是青年群体反抗抵制主流文化的“景观式表演”，为社会变迁引发的各种矛盾提出了“象征性的解决方式”，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进行表层式博弈。

## 6 结语

本文的研究缘起于2020年5·4青年节之际，Bilibili视频网站发布了青年宣传片《后浪》，随后该视频登陆《新闻联播》前黄金时段，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迅速扩大。社交媒体时代，媒体技术的日益精进降低了受众发声的门槛，拓宽了用户发表意见的渠道，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侵袭，受众面对主流文化传播不再全盘接受，而是基于自我认知体系和态度价值观重新构建和传播新内容。正如本文研究案例《后浪》，当视频最初处在大众传播阶段时，各大官方媒体积极进行原文转载或评论转载，传递主流意识形态；随着传播权力的不断下沉，受众的深入渗透，传播过程中开始出现另类声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甚至超越了主流文化，成为新的反《后浪》文化，这是一次发生在青年群体内的、影响力超乎寻常的话语事件。本文从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框架理论入手，探寻此次话语事件对青年身份认同有着怎样的影响，以及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

首先，本文从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理论的文本向度入手，依次以《后浪》文本和评论文本为研究对象，从词汇选择、语气、情态化表达以及隐喻四个方面进行语言学分析，得出二者在青年身份的话语建构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形象定位；其次，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渗透，在话语实践向度，重点关注文本的互文性，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阶段。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聚焦《后浪》粘贴的互文性手法，从历史视角、创作视角和文化视角得出《后浪》文本的生产思路不仅包括了对历史文学作品思想的传承，还结合了当下新兴环境，在不违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更新了文学记忆，使得“积极进取”的后浪文化不断延续；在文本的分配阶段，结合web2.0时代下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四种传播渠道，着重分析了《后浪》的传播过程、传播类型和传播效果，发现另类观点的出现主要集中在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阶段，这也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交互性、即时性和便捷性；在文本的消费阶段，以受众或用户为主体，重点研究受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行为，从连贯性视角来看，三类解释者中出现连贯性断裂情况的几乎全部集中于个人身份的抵抗性解释者，连贯性的断裂必然伴随着假设不依赖，所以，青年群体身份认同出现裂缝，从而不会得出具有连贯性的意义；从拼贴/同构的角度来看，反《后浪》话语中存在大量的创作式解码，这些原创作品都是基于拼贴或同构的思路对《后浪》

进行戏拟和仿作，从而达到亵渎主流文化、传播亚文化的目的。最后，费尔克拉夫的社会实践向度以权力为中心，为上述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读视角，研究发现在《后浪》的话语传播过程中，存在三种权力的博弈，即媒体资源的博弈、解释权的博弈以及文化的博弈，不论是哪种权力的博弈，都显示了青年群体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抵抗，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挑战以及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尝试性的解决。

青年是一代又一代的希望，历来是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实施霸权的对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阶级对立矛盾越来越深，于是出现了反对主流的青年亚文化，由于青年亚文化的迅速出现和高效传播，立马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它抵制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冲击了当今主流文化地位，尽管它始终处于符号层面的仪式化抵抗，尽管它并不能够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或商业文化收编，但它依旧以噪音的形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发起冲击，干扰霸权的顺利实现。因此，青年亚文化给霸权文化带来的危险在于缓缓蔓延开来的火花。

但是，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并非一如既往的对立。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始终将青年亚文化看作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和一种实践，只是这种文化和实践的创作主体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也更多的体现在“抵抗和收编”中。事实上，首先，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并存的异质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下呈现出多样性、碎片化、断续性等表征，这打破了亚文化的单一归宿，开拓了新的社会文化连接渠道；其次，青年亚文化有效弥补了主流文化的漏洞与不足，不断适应分众传播思想，满足各个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体现了自身的特征和意义；最后，符号体系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在亚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创作主体不断输出新的文化符号，为主流文化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激发主流创作者的灵感，推动文化的创新。

总之，《后浪》话语事件中主要体现的是主流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博弈。但是，不论是故意曲解还是顺从解读都符合当今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青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也更应该被辩证的看待。

## 参考文献

### 专著:

- [1](美)埃弗雷特·M·罗杰森.《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6
- [2](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3](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 [4](荷)梵·迪克.《话语,心理与社会》[M].施旭、冯冰译.上海:中华书局:1993
- [5](荷)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
- [6]费孝通.《社会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 [7](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1第2版
- [8](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 [9](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读本》[M]罗钢、刘象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0]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11]田海龙.《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 [12](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第二版
- [13](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期刊文章:

- [1]陈殿林.我国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建构与解码[J].当代青年研究,2011(08):1-7.
- [2]陈霖.新媒介空间与青年亚文化传播[J].江苏社会科学,2016(04):199-205.
- [3]陈一.新媒体、媒介镜像与“后亚文化”——美国学界近年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述评与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4):114-124+128.
- [4]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4
- [5]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01):37-42.

- [6]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1(04):305-310.
- [7]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J].新闻大学,2009(03):22-29+9.
- [8]耿芳.《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意识形态倾向——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07):155-156.
- [9]胡春阳.传播研究的话语分析理论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05):152-155.
- [10]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J].青年研究,2007(12):14-20.
- [11]胡疆锋.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J].新疆社会科学,2008(01):108-112+138.
- [12]纪卫宁,辛斌.费尔克劳夫的批评话语分析思想论略[J].外国语文,2009,25(06):21-25.
- [13]纪玉华.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3):149-155.
- [14]赖彦.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解读——批评话语分析视角[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25(S1):78-82.
- [15]李继东,吴茜.近五年网络流行语的青年身份认同与话语实践[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8):39-43.
- [16]李健.当前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及成因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23(10):54-56.
- [17]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J].国际新闻界,2014,36(07):6-19.
- [18]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37(04):88-96.
- [19]廖益清.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Fairclough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1999(02):2-6.
- [20]刘立华.传播学研究的话语分析视野[J].国际新闻界,2011,33(02):31-36.
- [21]刘立华.批评话语分析概览[J].外语学刊,2008(03):102-109.
- [22]刘玲华.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26-32.

- [23]刘文字,李珂.国外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趋势的可视化分析[J].外语研究,2016,33(02):39-45.
- [24]卢鹏.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J].青年研究,2014(03):84-93+96.
- [25]陆正兰.回应霍尔:建立第四种解码方式[J].当代文坛,2011(02):42-45.
- [26]马中红.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J].青年探索,2011(04):5-11.
- [27]马中红.青年亚文化:文化关系网中的一条鱼[J].青年探索,2016(01):74-83.
- [28]马中红.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转向[J].文艺研究,2010(12):104-112.
- [29]平章起,魏晓冉.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冲突、传播及治理[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35-41.
- [30]钱毓芳,田海龙.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03):40-43.
- [31]邵蕾.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的变迁[J].当代青年研究,2012(05):16-22.
- [32]施光.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综述[J].学术论坛,2007(04):202-205.
- [33]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14-134+204-205.
- [34]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37-44.
- [35]田海龙.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2):1-9+144.
- [36]田海龙.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两种路径及其特征[J].外语研究,2013(02):1-7+112.
- [37]田海龙.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J].外语研究,2017,34(03):60-64+71+112.
- [38]王伟军,孙晶.Web2.0的研究与应用综述[J].情报科学,2007(12):1907-1913.
- [39]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50-53.
- [40]王泽霞,杨忠.费尔克劳话语三维模式解读与思考[J].外语研究,2008(03):9-13.
- [41]项国雄,黄晓慧,张芬芳.新媒体与人际传播[J].传媒观察,2006(04):32-34.
- [42]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13(04):1-5+16.

[43]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06):63-70.

[44]徐素萍.《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两会”报道的话语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1(20):60-61.

[45]杨聪.浅析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05):53-56.

[46]张德禄,刘秀丽.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词汇语法[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101-106.

[47]张辉,江龙.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J].外语学刊,2008(05):12-19.

[48]张平功.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及表现[J].青年探索,2007(04):22-25.

[49]朱桂生,黄建滨.青年医生形象的媒介话语建构:从语言偏见到信任危机[J].当代青年研究,2018(03):12-18.

[50]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03):43-50.

[51]邹赞.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06):84-87.

[52]曾一果.抵抗与臣服——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新媒体数字短片[J].国际新闻界,2009(02):95-99.

#### 学位论文:

[1]白相辉.互联网对同性恋互动方式与身份认同的影响[D].吉林大学,2008.

[2]邓楠.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D].浙江大学,2004.

[3]高歌.仪式性抵抗与身份认同:对哔哩哔哩网站的亚文化研究[D].郑州大学,2017.

[4]顾亦周.文化对抗·文化疏离·文化衍替[D].苏州大学,2017.

[5]胡疆锋.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D].首都师范大学,2007.

[6]胡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青年话语和青年文化[D].中山大学,2013.

[7]李新民.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D].南京师范大学,2007.

[8]李雪.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2.

[9]林蓉蓉.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中女性形象的批评性比较分析[D].浙江大

学,2008.

[10]刘吉冬.中国互联网青年亚文化及其商业收编[D].华中科技大学,2010.

[11]刘思远.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网络流行语研究[D].江南大学,2016.

[12]陆新蕾.从话语再现到身份抗争:大众媒介与中国同性恋社群的互动研究[D].复旦大学,2014.

[13]马楠楠.城市空间的书写、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女性意识的独特表达[D].上海大学,2014.

[14]孟瑞.“身份认同”内涵解析及其批评实践考察[D].浙江大学,2013.

[15]孙来勤.身份认同与身份挣扎[D].东北师范大学,2012.

[16]佟菲.想象表演与自我呈现——“观展”范式下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D].上海师范大学,2013.

[17]王颖.政治语篇翻译的批评性话语分析[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8]王玉.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认同”[D].安徽大学,2016.

[19]王真.抵抗与收编:新媒体环境下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D].华中师范大学,2018.

[20]易柳.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对社会态度的感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D].广州大学,2011.

[21]张培斐.同性恋身份认同研究[D].西南大学,2014.

[22]张渊博.青年亚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D].山东大学,2018.

[23]赵晓露.“90后”大学生自我概念、群体身份认同及其关系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24]钟阳.基于费尔克拉夫三维分析模型的抑郁症新闻建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9.

[25]朱珠.网络空间中网民的身份认同研究[D].苏州大学,2013.

#### 报告: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 网页:

[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762842395854400&wfr=spider&for=pc>[Z]

[2]<https://baike.baidu.com/item/bilibili/7056160?fr=aladdin>[Z]

[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8203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82036)[Z]

[4]<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9588404/>[Z]

[5]<https://baike.baidu.com/item/文本分析法/4438929>[Z]

[6]Tim O Reilly.What is web 2.0[Z].

## 附录

《后浪》全文:

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着你们，像我一样。

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所有的知识、见识智慧和艺术，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可以尽情的享用。自由学习一门语言、学习一门手艺、欣赏一部电影、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很多人，从小你们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不惑于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你们只凭相同的爱好就能结交千万个值得干杯的朋友。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是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意。

向你们的专业态度致敬：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向你们的自信致敬：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赞美与鼓励。向你们的大气致敬：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更年轻的身体，容得下更多元的文化，审美和价值观。有一天我终于发现，不只是我们在教你们如何生活，你们也在启发我们怎样去更好的生活。那些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就像我一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这个世界会更喜欢中国；因为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因为你们，这世上的小说、音乐、电影所表现的青春就不再是忧伤、迷茫，而是善良、勇敢、无私、无所畏惧，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不用活着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力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

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那么：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 后记

时间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刻，即便有再多的不舍和留恋，也无法阻止春夏流转，随着论文的定稿，我的求学生涯也将告一段落，恍惚间还是三年前下着小雨的初秋，独自踏入校门的瞬间；又是一个阴雨的初夏，我又将与这三年光阴说再见，仿佛未曾来过又仿佛过了半生，收获与失去并存，也有遗憾也微笑离去。

在这三年以及未来的人生里，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张淑芳老师。张老师始终是我求学期间的明灯，她不希望我们错过任何一个学术讲座，开读书会时会认真指出我们论文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当你不认真的时候她会比你还生气，经常会提醒你要积极努力上进，也会常常询问生活上的近况，她不仅是一个学习上的良师也是一个优秀的人生导师。她教会我时刻保持希望，永远不要停滞不前。是她在我求学路上不断引导，不断督促，严格要求。“饮冰十年，难凉热血”，这一次的热血是被老师点燃的。

我还要感谢我本科期间的传播学老师王颖哲老师。是他带我推开了传播学的大门，带我在传播学的世界里遨游，发现传播学的魅力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它。他不仅是我传播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最明亮的灯塔，照亮了那段考研最灰暗的日子，如果没有他的鼓舞，也许不会有这样一天，更不会有在这一刻写致谢的我，王老师您永远是我们的男神！

感谢我的母亲，一直默默的支持我，以我为荣。感谢我的男朋友何沐恩，在一起的这么多年里，是他一路为我的梦想保驾护航，不断努力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一心求学。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小猫咪张国庆小朋友，感谢她做了无数个深夜的“伴读书童”，希望她健康茁壮的成长。

谢谢我的舍友和导师组的小伙伴们，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难忘的日子，写下文字的时候那些在一起的点滴如电影般掠过眼前，在青春最美好的日子里，真心感谢你们的陪伴，彼此携手走过了一段有哭有笑的珍贵时光，祝福朋友们都拥有灿烂的未来。也很感谢小竹子、小娟子、韩老师和楠仔的一路相伴，虽然我们并不时常相聚，但依然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